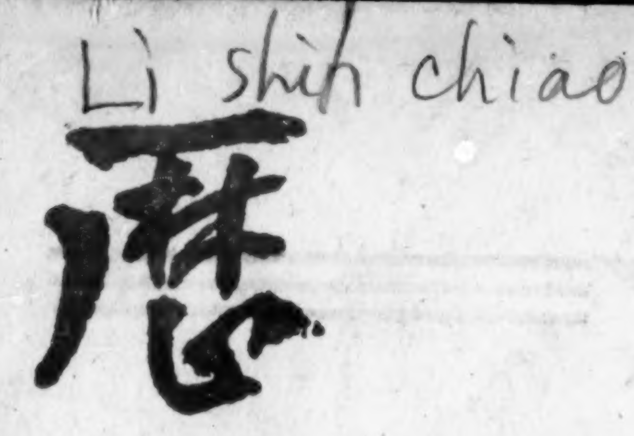










特大

第二卷
第六期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歷史教學月刊社出版·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目錄

歷史教學

·月 刊·

第二卷

第六期

通卷第十二號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編委會

出版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天津羅斯福路

各地新華書店均可訂閱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歷史教學訂閱辦法

1. 本刊訂爲月刊，每月一日出版，實價二千八百元。
2. 本刊三月三期實價八千四百元，半年六期實價一萬六千八百元，全年十二期實價三萬三千六百元。
3. 本刊發售價格變動或特大號加價時原訂戶不受價格漲落影響。
4. 訂閱本刊平寄郵費免收，掛號每期另加掛號費。
5. 郵寄刊物的中途遺失，若爲掛號寄遞，本店負代查之責。
6. 訂戶由本店經常供給圖書目錄。

徹底改造思想加强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

何　遠

一　思想改造是加强愛國主義歷史教學的先決條件

「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爲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註一）

這是毛主席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席上的講話，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指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重要條件之一」。其意義的重大，是史無前例的。具體到歷史教學工作者來說：就可以明確如果沒有思想改造或改造的不好，就很難完成人民所給予的任務。

中國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繼續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建設我們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因此歷史教學工作者的中心任務是繼續加强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

自京津解放後，在歷史教學上曾經提出了如何貫澈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去年美帝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又進一步明確的提出來如何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問題。「兩年來課程的改革雖也作了些工作」，「教師中已有不少關於教學方法的改進和創造」，「但距離實際的需要還很遠」，「在我們不少的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着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特別是崇拜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我們的教師中還存在着相當濃厚的個人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思想和態度」。「在我們的教師中還嚴重地存在着理論與實際分離的教條主義」。這就充分證明「今天在我們教師中間所存在着的錯誤思想恰正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思想，另外還有封建思想和買辦思想的殘餘」。（註二）　像這樣要想進一步加强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完成培養大批能夠全心全意爲人民教育服務的人才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爲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非常軟弱和動搖，根本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更不能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建設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買辦思想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爲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的敵人，這種思想在一切方面是長敵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沮喪和挫敗中國人民自己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人民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的愛人，再加上他所經管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脚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註三）

這是毛主席昭示文藝工作者應該堅定立場，改造思想，歌頌勞動人民，爲勞動人民服務。今天對於歷史教學工作者來說，也是如此。我們今天的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就是要「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就要熱情於「人民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就是要「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試問肩負着這種偉大而艱巨任務的歷史教師，

「還是服膺着英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着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得不到確實的改造」，要想能够編出精簡合用貫徹愛國主義的教材來，還想實行眞正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的教學方法，豈不是「南轅北轍」！

今天我們從事歷史教學的，「幾乎絕大部分是從舊史學的發霉的書庫中培養出來的。因之舊史學的傳統我們多少都保留着」。（註四）或者還多少有些「對自己的東西旣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註五）現在，我們對於歷史教學的要求是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通過具體的歷史材料和歷史發展規律，走向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並武裝青年一代的頭腦，使之變成毛澤東的優秀學生和革命戰士。因此在本國史教學中，應該從實際出發闡揚我們祖先向自然向壓迫者鬥爭的精神，表揚我國的文化藝術、科學發明和英雄人物，以及着重表揚近百年來我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闡明這種鬥爭終於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偉大的勝利。在世界史教學中，應該與國際主義相結合，表揚各國勞動人民歷史的創造，闡明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經驗，宣揚蘇聯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上所起的偉大作用和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鬥爭的英勇事蹟。那麼我們就應該用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也就是應該用馬克斯列寧主義和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來改造阻碍着我們前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就必須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掌握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有的放矢針對着自己的思想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不但是提高和改造自己思想的最正確的辦法，也是提高業務和加强愛國主義歷史教學效果的先決條件，道理是非常明顯的。

有極個別的同志認爲：加强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是單純技術問題，或在教學上言語態度等形式表現問題，與自己的思想改造無關宏旨。這不過是作爲拒絕自我改造的藉口、不顧意虛心聽取同學接二連三所提的意見和不願從思想改造的擋箭牌罷了。

二　思想改造和愛國主義歷史教學的光輝榜樣

蘇聯十月革命後對於知識分子幹部的改造工作，雖然具體情況與我國今天不相同，但因目的和方向的一致，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參考的。

蘇聯對於知識分子改造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在革命成功初期，有的教育工作者怠工，甚至有的教員們拒絕到新的學校上課。當時一面依靠教育工作者中的進步分子進行工作，一面向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打倒怠工。同時用極大的耐心來改造、教育廣大的知識分子羣衆。

蘇聯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首先從思想改造開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不了解革命任務，對革命認識不够，認爲只有他們自己知識很深，學問很高，認爲工人階級不一定能够了解理論，不認識過去爲資產階級服務的錯誤。他們更不了解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思想，現在已經隨着資產階級社會的沒落而沒落了，已經是反動的思想了。資產階級思想，是主張種族歧視、民族互相壓迫，少數帝國主義統治世界，製造戰爭是反動的思想；社會主義思想，要民族間互相友誼，爭取民主，爭取和平，這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前者是反動的道路，預備殘害人類的道路；後者是前進的道路，爭取和平爲人民謀福利的道路，只有這兩條道路沒有第三條可走。如果有人在這兩條道路中間徘徊，就可能掉到最反動的資產階級道路上去。所以蘇聯在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時候，充分地用了啓發和說服的方法，究竟你要走那條路？選擇那條道路？是走沒落潰爛的資產階級道路呢？或者是走新生的道路？要爭取的不是昨天，而是明天人類的幸福，在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繁重而艱巨的。

蘇聯在改造知識分子過程中，曾經舉行過多次會議，如討論會，使知識分子來學習，使他們能够進一步學習，能够進步，在這方面所花的時間是很大的。曾經動員所有的教員，使他們自動的參加怎樣改造學校，怎樣改造教學方法。曾經耐心的去揭穿、去反駁反動的思想。曾經用很大的耐心解釋說明犯錯誤的原因。曾經很好的使用過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因此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上收到輝煌的效果。使每個知識分子了解政府和黨的政策。

蘇聯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是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爲武器的，現在蘇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都記得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會議上所講的話：「沒有什麽必要使醫學專家同時又是物理學家，或是植物學家，反之，也沒有必要使後者又是前者。但是有一個科學部門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中的布爾什維克必須知道的，就是馬列主義關於社會、關於社會發展規律、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規律、關於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現在蘇聯知識分子已經完全能够在政治道德方面，得到統一的思想，就是說他們能爲蘇聯人民服務，他們的思想已經與工人、農民溝通一氣。在蘇聯任

何勞動都受人尊敬，人民教師的工作也是最受人尊敬的勞動之一。教員們只要工作成績很好，可以得到獎章或勳章。教員們還可以被選到政府機關工作，上至最高蘇維埃下至地方蘇維埃，都可以被選作代表，因爲政府同黨關心教員，所以蘇聯教育工作者，非常熱愛黨和政府。（註六） 這就是蘇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良好榜樣。

蘇聯現今馬列主義在歷史上的發展是斯大林的科學功績。斯大林發展了馬列學說，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指出哲學唯物主義的原理無條件的可以推廣到研究社會歷史：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那麼社會生活中各現象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規律的發展，社會的歷史研究已成爲一種科學。馬克斯和恩格斯早就說過：「我們認爲只有一個整體的科學，就是歷史科學」。但由於斯大林善於創造性的發展理論，善於利用理論去解決革命實際問題，使「歷史科學」大大地豐富了內容並向前推進一步。

斯大林在自己革命生活中，都是保衛歷史科學。他和列寧在一起，對文德班（Windelband）和李凱特（Richert）的繼承者們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學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們的主觀主義予以嚴厲的批判。粉碎了資產階級「理論家」民族主義，僞工人運動中的國際主義的理想僞民族之間的平等而奮鬥；粉碎了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和世界主義，僞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而奮鬥。因此奠定了蘇聯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指導原則。

斯大林和他最親密的戰友，親自積極參加闡發歷史科學，指導按照唯一的正確的馬列主義科學路線工作，指出工作的錯誤所在並組織進行改正錯誤，對歷史科學工作和歷史教學不斷的改進和提高。例如：一九三一年斯大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封信——「論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幾個問題」，揭發托派僞造歷史事實，號召歷史學者發揮創造性，與歷史僞造者和腐化自由主義作鬥爭。一九三四年五月政府和聯共（布）中央由斯大林提議通過「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史」底決議。須「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斯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一九三四年八月，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發表「對於蘇聯歷史和近代史教科書大綱的意見」。指出以後編輯教科書的方向。一九三六年，政府和聯共（布）中央審查教科書初稿，指出錯誤的觀點與所謂「頗克洛夫斯基歷史學派」相關連。指示克服這些有害的觀點的任務是編輯教科書、發展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和提高歷史教育的前提。一九三七年被提出參加競賽的若干新的蘇聯歷史教科書證明在歷史科學上已有確實的進步，那些反列寧主義的形式主義和「社會學主義」都已經肅清。因此給蘇聯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的進行，創造了有利條件。

蘇聯學校的全部教學——教育工作，對於解決愛國主義的任務提供了卓越的可能性。蘇聯學校每個教師——不管他教的是那門功課——除去教學之外，還要解決以下的任務：發展並培養學生們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成他們的愛國主義觀點和信念，鼓舞學生去做愛國主義的事業。在培養學生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上，特別有價值的是歷史的課程。在學習蘇聯歷史過程中，從始至終的滲透著對於人民英勇事蹟的熱愛。理解到人民自由而幸福的生活，是在艱苦、頑强鬥爭中取得的。體會到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由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這便教育著青年一代去愛工人階級，熱愛並忠實於共產黨和黨的領袖們。通過歷史的學習，學生在具體的事例上，看出蘇聯怎樣和舊事物進行的鬥爭中產生新的事物，這個新的又是怎樣長大的，怎樣發展的，雖然到處都是障碍和阻撓。研究過去，特別是研究現代，才可能理解社會主義現實的偉大。（註七） 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年代，特別顯著的證明了蘇聯愛國主義蓬蓬勃勃的力量。全蘇聯人民，奮起保衛自己的祖國，維護祖國的榮譽和獨立，斯大林特別指出：「後方蘇維埃人民的勞動功勛，也和我國軍人在前線上永垂不朽的戰功一樣，其根源就是熱烈而奮發的蘇維埃愛國主義」。（註八） 第二次大戰後，蘇聯飛速地恢復和建設著被戰爭破壞的幸福生活。到去年已完成了戰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開始進行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蘇聯已成爲保衛世界和平無比强大、無比幸福的國家。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的先進經驗和所收到的偉大效果。

以上是蘇聯知識分子改造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簡單的輪廓，當然是掛一漏萬。不過我們要明確的是：蘇聯人民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將來要走的道路，過去我們「以俄爲師」得到了很大的勝利，今後我們仍要「以俄爲師」學習蘇聯人民的建國經驗。具體到思想改造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上，蘇聯也是我們學習的寶庫和燈塔。

三　今後努力的方向

毛主席說：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的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

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達到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註九）

農民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爲我國現階段一個公民來講，是必然也許可存在的，但作爲一個人民歷史教師來講，是不應該也不許可存在的，不但不許可存在，還應該及早的加以肅清，因爲一個人民歷史教師不但肩負着「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關係」的任務，同時還肩負着訓練能担負這種任務的青年一代。這種任務，是歷史的任務，同時也是革命的任務。這種偉大的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負担，也必須由革命人民來負担。同時「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註十）因此，我們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長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註十一）一個人民歷史教師，首先必須加强革命理論的學習，加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和方法，在思想上脫胎換骨，作到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身。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和方法研究歷史，才是眞正的科學的歷史，把科學的歷史應用到教學中去，才是眞正的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

科學的歷史研究和愛國主義的歷史教學，在我們國家內，還僅僅是一個開始，才開始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由個人研究轉向集體研究，由名山事業轉向人民事業，由貴古賤今轉向注重近代，由大漢族主義轉向各少數民族，由歐美中心主義轉向亞洲史及各洲史。所以今後還須不斷地付出最大的努力。（註十二）

我們今後應該用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來研究歷史，才能眞正的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注意研究近三十年的歷史；歷史是啓發愛國心的一門科學，這三十年激烈的階級鬥爭與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相結合的歷史，將會使我們人民的愛國精神更爲高度地發揚起來。研究歷史一方面要把愛國主義發揚光大，同時更要很好地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現在我們抗美援朝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鬥爭，就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具體表現。今後工作，就是認眞學習，認眞研究，一點不能虛僞輕浮。（註十三）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

一九五一、十、三十日於河北師院

註一：毛澤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會詞。（見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註二：錢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學習雜誌五卷一期）

註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註四：尙鉞：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

註五：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註六：杜伯洛維娜：蘇聯的教育工作（在瀋陽各界歡迎蘇聯文化代表團教育座談會上的講話。）

註七：李德方等譯：蘇維埃愛國主義教育。

註八：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註九：毛澤東：實踐論。

註十：毛澤東：論新階段。

註十一：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註十二：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九月二十九日進步日報）

註十三：吳玉章：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九月二十九日進步日報）

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六周年

禹一寧

一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衝破了中國民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

劉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延安「一二九」九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說：

「自從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黑暗反動的時期」。特別是一九三三——三五兩年間是「中國民族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陳伯達同志語）。在這個時期，蔣介石實行了他的「對外投降，唯恐不卑不恭，對內屠殺，唯恐不兇殘」（黃松齡同志語）的反動政策。那時的情形是：

一方面蔣介石大量出賣領土主權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繼「九一八」、「一二八」之後，他又出賣了長城以外的地方，並「訂立了一連串的賣國協定：塘沽協定，大灘口協定、大連協定、何梅協定等等，把華北五省的實際統治權出讓給日本」。（栗蟆生：現代中國革命史話）。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間，國民黨的冀東區督察專員殷汝耕成了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同時蔣介石又親自把冀察晉三省平津兩市另劃成一個行政區域，設立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指定漢奸王克敏、王揖唐等爲委員，以變相的自治使「華北特殊化」而出賣了華北。所以華北的局勢已是岌岌可危。

一方面中國人民不能容忍蔣介石這種賣國行爲而引起了憤怒！一九三五年的五月間在共產黨員吉鴻昌及抗日將領馮玉祥方振武等領導下成立察綏抗日同盟軍在長城外抗日，結果爲蔣介石陰謀破壞。六月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表了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的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抗，這個宣言給予了當時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不久，由於日帝的加緊侵略和蔣介石的徹底賣國，更加甚了中國的危機，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北上抗日的長征途中發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是一個提出抗日戰爭正確路線的重要文告，這個宣言更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與支持。許多人都清醒的認識到亡國滅種之禍已迫在眉睫，特別是北平的青年學生們，深深地感到「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書桌」（北平學聯宣言）的危機，如果再拖延下去，全華北就會跟著殷汝耕實行「自治」，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兵不血刃地據有了，所以他們都積極地起來反對，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號召和劉少奇同志等的領導下，爆發了反對賣國的「一二、九」愛國運動，要求「保障領土完整、反對防共自治，停止內戰，外交公開，並允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這個運動一爆發便衝破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結束了中國的反動時期，開始了新的革命運動的高潮」。（劉少奇同志語）。並從原來只限於中國蘇維埃區的革命運動發展爲全國性的公開的革命運動了。

二 「一二、九」青年所走的道路乃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一二、九」運動中的青年已經接受了以往一些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所以在運動一開始便很堅强的團結，組織力量來發揮頑强的戰鬥精神，因此能用血肉之軀衝開關閉的城門；他們也能運用較成熟的鬥爭策略，向沿途及在城上的軍警揮淚演講，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口號，來孤立敵人，增强自己；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摸索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就是已了解到單純的學生革命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而必須與工農結合，因此在「一二、九」運動之際，雖然在軍警的監視下，他們仍然分散成小組，用「游擊戰」牽掣軍警分別跳墻出去，到工廠中去宣傳。不久，又在平津學聯的號召下，利用寒假，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北京三團、天津一團），沿平漢路南下到農村中去宣傳抗日，當時參加的有三千人之多，在一月三、四日臨出發時，他們也都莊嚴的宣誓說：

「我們下了最大的決心出發宣傳，組織農民，不達目的，誓不回校」。

這個誓言說明了這些青年知識分子要求與廣大農民結合的決心，雖然在

進行中遭到反動派特務的迫害，並且最初農民還誤解他們爲「吃敎的」；但是因爲他們有改造自己的決心，冒着嚴寒風雪來克服困難。就這樣，使得他們在農村中宣傳時，親眼看到了農民的痛苦；在和農民談話中，又體會到農民要求革命的迫切，因而敎育了他們，想到建設新中國的需要，想到只有改變社會制度才能解除農民的痛苦，深深地鼓舞起革命的熱情。同時由於這一次的下鄉宣傳工作又奠定了這些青年知識分子以後在華北一帶抗日的羣衆基礎。這正是黃松齡同志所說那樣：

「一二、九運動沒有把自己局限在只是學生孤軍奮鬥的狹小範圍內，而是通過了學生的橋樑，立即轉向全國廣大人民，尤其是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建立了深厚的羣衆基礎」。

這也正是毛主席對我們的敎導，就是：

「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民衆相結合」。

每一個要求改造自己，決心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是應該切記不忘的！

三 「一二、九」運動是推動全國走上抗日戰爭的一個有力因素

「一二、九」運動不單純是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是全中國各階級各黨派蓬勃的愛國運動的開端。因爲這個運動在一開始時就得到全國廣大的愛國人士熱烈響應，並且其影響很快的普遍了全國，紛紛自動組織起來，其中如「平津文敎工作者就組織了『文化界救國會』和『北平文化工作者協會』，上海以九六老人馬相伯和魯迅先生爲首，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他們都一致的堅決的要求領土主權完整，號召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採取有效的行動救國禦侮」。（許德珩：「一二九運動十五周年」）。另外還有許多婦女，工人也都分別成立救國會，最後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成立了一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來從事這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愛國運動，甚至還影響到反動集團依靠來進攻革命的軍隊中去。因此說：這個運動，「不僅包括了學生、工人和農民，也包括了民族資本家，商人、店員、教育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新聞記者、律師、醫生、軍人、政客、名流、學者等各種各樣的人物在內，形成極廣泛的統一戰線」。（栗螋生：前書）。並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日救國浪潮，這個浪潮與紅軍北上抗日的武裝運動相結合，便爲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了準備，而揭開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

『「一二、九」運動不僅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鋒芒和國民黨反動派所鼓吹的賣國內戰的陰謀活動，掀起了廣泛羣衆性的救亡運動高潮』；（一九五〇，十二，一，天津日報短評）而且是爲抗日戰爭準備了優秀的幹部。如參加南下宣傳團及爲到南京請願所組成的「軍社」中的愛國青年，當他們分別從高碑店、南京等處被解散和押送回北平後，毫沒有消失戰鬥意志，反而更堅強地組織了永久抗日團體——救亡先鋒隊。就是後來有名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基礎。而許多經過「一二、九」運動鍛鍊出來的青年幹部後來都「散佈到全國各地，特別是在敵後解放區與廣大人民結合，堅持戰鬥，建設了民主的解放區，並且贏得了抗戰的勝利」。（一九四五、十二、九、解放日報社論）

所以說：『「一二、九」運動在思想上政治上、在羣衆中爲抗日戰爭作了準備工作』。（彭眞同志語）而成爲推動全國走上抗日戰爭的一個有力因素。

四 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二、九」運動的基本口號是「一致對外」，要求「中國完全獨立」，因此確定了它的基本任務是「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爭取民主」。這些正是當時全中國人民的渴望。並且這個運動在發動和教育廣大愛國青年英勇地參加抗日鬥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生存，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所以應該肯定這個運動是中華民族光榮的革命傳統。

革命傳統是馬克思列寧所珍貴和重視的，是應努力保持而在人民之中鞏固起來的。今天中國的青年應當爲這個光榮的革命傳統而驕傲，學習「一二、九」青年改造自己，努力與工農羣衆結合的決心，並爲發揚這個光榮傳統而站在抗美援朝鬥爭的前列。

一九五一、十一、於南開大學

榆關事件前夕歐洲戰債問題

傅彬甫

一

「九一八」事變之後，美政府很快的確定了對此事件的政策。日本駐美大使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商定一項美日秘密諒解：即美國「不與聞滿洲事變」，澈底帮助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以增强日本的反蘇地位；日本允許美國在中國「什麼事都好商量」，日本軍事佔領限於錦州以北，不再往南妨害美國權利。於是美國首先指使其狗牙蔣介石實行所謂「不抵抗主義」。

不過，這個諒解是互相欺騙的。美國的意圖在於自己先放棄滿洲，換取日本進攻蘇聯，再用蘇聯力量削弱日本，從而它最後攫得中國霸權。日本的意圖在於擺着反蘇的姿式，換取美國的讓步，加緊佔領中國土地，從而造成它獨佔中國的優勢。因此，在這個諒解成立之後，日本並沒有停止其向南擴張的計劃。而美國則大肆施展其兩面政策，「即一面於帮助日本取得滿洲作根據地之後，又在中國內地繼續讓步，以貫澈鼓勵日本反蘇的方針；另一面，則對日本擴張加以某些限制，裝出一些積極對日的姿態，使日本不致過分妨害美國的利益，爭取美國單獨控制中國內地。」（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榆關事件前後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就是一個實證。

日軍進攻臨榆縣城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元旦夜間，三日作戰最爲激烈，山海關遂於是日下午二時失陷。臨榆內外大火至四日午間仍烟焰衝天，城內人民被殘殺者甚衆。這就是榆關事件。榆關事件是錦州事件後日本又一向南擴張的主要行動；這一行動的目的是攻佔熱河，威脅平津，軍事侵略正式的進入到中國華北。當然，這一行動，對美國單獨控制中國內地的企圖是很不利的。所以美國就馬上照會英國政府，「願與英國討論戰債問題，進行『軍縮合作』，以『消滅遠東戰禍』，對日本作一警告。」（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企圖限制日本向中國內地擴張勢力。

爲什麼美國拿歐洲的戰債問題，可以拉攏英國，警告日本呢？本文即欲對此問題加以簡單的說明。

二

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以貨物形式借與協約國計有二十億零五千五百萬美元，而英國欠美國債款佔美國放出債款百分之四十，（見一九三二年英致美第二次覆牒）法國欠美債款所佔的百分比也很大。因此，美國在大戰以後就成爲歐洲尤其是英法兩國的債權國，英法必須定期向美國政府償還一筆債款。

但自一九二九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恐慌，很快的就傳佈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以後到一九三二年在歐洲英、法、德、意諸國，已經發展到很危急的地步了。在這種情況下因爲德國的財政破產，使德國已無支付賠款的能力，所以產生了德國的賠款的問題。但德國的賠款又與英法諸國償還美國戰債有莫大關係。例如美國緩債一年的辦法至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已經期滿，一九三三——一九三三年法國應付美債九六五、○○○、○○○佛朗，應付英債五○○、○○○、○○○佛朗，總數約一、五○○、○○○、○○○佛朗。而法國以賠款收入爲償付戰債的主要財源，如今德國既不能給付賠款，產生了賠款問題；法國亦即不能償付戰債，產生了戰債問題。因此，賠款和戰債就成爲聯鎖。德國如要求豁免或減削賠款，歐洲英法諸國勢必要求美國豁免或減削戰債。所以，一九三二年歐洲諸國的洛桑會議，美國既未列席，戰債問題未能有所解決，賠款問題雖然得到了協議，却只能暫緩歐洲的緊張形勢，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於是在洛桑公約之外，又產生了所謂「紳士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主要的是：（一）對賠款的債權國家相約必使其本身債務滿意解決之後，始批准洛桑協定。（二）英法兩國政府訂定「信用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兩國相約以一致行動促使歐洲各國合作，暗示英法將聯合歐洲各國一致對待戰債問題，給美國一個威脅。這樣，洛桑會議之後，戰債問題更日趨尖銳了。

但解決戰債問題的鎖鑰，只操諸美國手中。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通貨緊縮，一九三二年「所有的貨價（即應償的債欵）已倍於借時的物價」（見一九三二年英致美之第二次覆牒）所以這時期英法諸國雖事實無力償付戰債，而美國收回借欵是很有利的。於是美國討債英法賴債的帝國主義間的醜劇，便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演出了。

三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美國討債和英法等國賴債的醜劇也日益緊張起來。英法諸國屢以「償付戰債，足以阻碍繁榮之恢復」等名義向美政府請求延付戰債；而美國則堅決不允延付，向英法討債。戰債問題遂成為歐洲各國財政經濟上中心問題之一。

這時候正當美國大選，在大選揭曉以後，英國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美國政府提出照會，聲明英國在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不能照付。它的理由是：「世界的繁榮，非俟戰債重行調整以後不能達到，去年胡佛總統停付提議，仍未克實現經濟照蘇的希望，其後洛桑協定可謂有關係恢復世界繁榮及國際財政上之最大貢獻，但欲達到目的，必須有美國合作，所以與該協定的有關政府，不得不採取向美國商請之途徑，提議在商權解決此事之會議期內，暫停付欵。」英國照會發出之後，法國政府亦有同樣的照會致美，請美國依照洛桑會議先例在兩國互相信賴之空氣中，繼續討論戰債問題，而在完成解決以前，暫停付欵。十一月十一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接到英法通牒，遂即呈遞總統胡佛請其裁奪。這就是英法兩國正式聯合趁機賴債的行動。

而美國總統胡佛則因其選舉失敗，未來總統屬於民主黨羅斯福。照美國慣例現任總統不能拘束後任總統的行動，不能裁決這樣重大問題。於是，便回到華盛頓電約羅斯福到白宮商談此事。羅斯福的意見是：（一）美國與歐洲各國的戰債問題可由現有外交機關談判，不必改由國會或另組委員會辦理，亦即須與美國個別談判，不能開一總會議使債務國和債權國各立一方以求問題的解決。（二）當年十二月到期的英法戰債必須償付。（三）戰債問題與賠欵問題必須截然分開不能混為一談。這一政策總的精神，就是要打破歐洲各國一致戰線對美的策略。因此胡佛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表宣言答覆英法等國，不同意延長停付期限。這就是指明英法的戰債必須討還。

美國旣不允延付戰債，則英法一致的賴債行動即成泡影。因此在美國覆牒發出之後，英國方面，磅價驟落，市場大受影響，而英國却因欲維持其世界金融市場之威信，只好咬緊牙關設法還債。法國方面，則因賠欵減少，實際無法還債，釀成了倒閣的危險。這樣，法國遂一再責難英國，認為必須繼續賴債。因此英法一方面發出了第二次賴債覆牒，痛陳需要停付緩付的理由；另方面計劃歐洲戰債國聯合對美的行動。但事實上英國初不願堅持這一行動，且與法對立的意國也已經照付債欵，聯合陣線的計劃又告失敗了。十二月八日美國答覆英法仍是不願延付戰債、減少戰債。自此英法到期的戰債已確定必須償付。而洛桑協定即因之行將成為廢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按期償付的國家計有英、意、捷克、芬蘭、拉托維亞、立陶宛六國共償美金一萬二千五百萬元。未付債欵的國家計有法、比、波蘭、愛沙尼亞、匈牙身五國，共額二千五百萬美元債。債的結果，法國赫利歐內閣倒台了，比國內閣也崩潰了，其他歐洲各國經濟上均增加了混亂的程度，經濟危機更形嚴重了。

但在這種情況下面，帝國主義國家間賴債討債的醜劇並沒有停止，像法國彭古內閣組成以後仍繼續了賴債行動，像英國雖然還了債但又聲明這次還債必須視為按現行英美戰債協定之最後一批，希望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之前接洽此事。而美國的態度則仍是繼續堅決的討債，更因值新舊總交替時期，使戰債問題完全陷入了僵局。

這種僵局說明帝國主義間——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矛盾加深了。英法對美國的極端不滿，促使他們要報復美國，而報復美國的方法。在亞洲 就是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及日漸南下擴張的行動，都不聞不問，甚至同情日本，以使美國在侵略中國的競爭上趨於失敗的地位。相反的如果美國打算聯合英法孤立日本的話，在亞洲那也只有緩和歐洲戰債問題的辦法，作為拉攏英法的手段。

四

榆關事件無疑的是日本向中國內地擴張侵略，妨害所謂「美國利益」的行動。這樣，美國自然不能坐視，其在國際間所採取的行動，也就必然是要以緩和與英國因戰債問題所釀成的僵局，才可以作出一種積極對日的姿態。

但是榆關事件以後，一九三三年的三月間，日本又尋找藉口，向蘇聯挑釁，破壞中東路，佔領車站，對美國做出一個要反蘇的樣子；這時美國却在無聲裏縱容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了。因此，榆關事件前後美國態度的變化過程——尤其是美國對英國戰債問題態度之變化過程，更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美國對日實行兩面政策的一個例證。

牒發出之後，英國方面，磅價驟落，市場大受影響，而英國却因欲維持其世

後美國對日實行兩面政策的一個例證。

雲南回民起義史料(續)

丁則民譯

（二）

馬如龍和馬德新的降服使雲南政府不致立即垮台。但當時這件事的作用也很小。在西部，杜文秀的態度仍舊未有改變，甚至東部仍有許多叛變的城鎮。馬如龍被派担任總兵後，於一八六二年春季他爲漢人進行第一次戰役。在他不在雲南府的期間，一位回軍的參將發動叛，刺死總督。雲南府是有被刼掠的危險；滿清官員爲了順從公衆的輿論，暫時舉出馬德新担任總督的職務。一個未有官級的平民（雖然他有名望，還是因爲他是馬德新的緣故）忽被提升到漢人官員所渴望的最高位置，即皇帝直接代表的地位。依我看來這是整個戰爭最特殊的事情，同時比起其他的事情來，牠更足以說明當時的紊亂程度了。馬如龍馬上收兵歸來，担任最高指揮，經過短期的尖銳戰爭後恢復了原來的秩序。第二年，一位新的總督到任了，派遣兩支軍隊由不同路線同時進攻大理。這兩支軍隊都遭到全盤的慘敗，只有少數被衝散的殘餘部隊逃回雲南府。由於迫切的需要，一八六四年派遣一支遠征軍到本省的東北邊界，因爲那裏的苗族（作者用 Mautyu ，恐係苗族譯音之誤——譯者）造反，並把由雲南直往中原及北京的孔道割斷。指揮遠征軍的重任付託予岑毓英，他是新近爲大理軍隊所擊敗的兩位將領中的一位。岑（毓英）發覺這項工作比他所想像的困難多了。苗族是粗野，健壯的山居民族，男子經常從事打獵和伐木，婦女則耕耘田地，負担供應糧食的責任。他們的村莊位於山頂的懸崖上，四週爲森林所環繞，只有通過羊腸小道和絕壁才能行近他們的村莊，因此牠據有天然堡壘的防衛。因得這些有利條件之助，苗族雖然大部份的武器僅係長矛，却證明他們遠非岑（毓英）的漢軍所能匹敵者。岑（毓英）只得依靠其他的方法。他對酋長保證，假使他們歸順，他們定能被任命做滿清的官員，他們的人民也不會受任何的騷擾。酋長們相信了他的保證，表示願意歸順。漢軍開進村莊，剛一佈置就緒，在遵守將軍的命令下，馬上殘忍的屠殺居民。所有婦女如蒙赦免，即被拐賣爲奴。當這項任務快要完成時，委派岑（毓英）爲雲南巡撫的一件指令，已自北京發出，不久他便收到了。

在這叛亂開始時，岑毓英是個年青人，暫時担任小縣的知事。憑着他的活動和能力引起馬如龍的注意，馬如龍發覺他是較其他漢軍指揮更堅強的一位敵人。馬（如龍）爲滿清服役後，他最初措施中的一項便是推薦岑（毓英）充任當時出缺的布政使，這是省行政中列居第三的高級職位。這向所未聞的提昇激起很大的反對，但馬（如龍）實現了他的意志。對岑（毓英）能力的估計他並無錯誤；但假使他認爲他在提拔一個有力的助手或支持者的話，那他就受了大騙。因爲從那個時候起，岑（毓英）已獲有獨立行動的地位，對於其他的同僚，甚至包括他的恩人在內，他現出極強烈的妒忌心，並且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反對和阻撓他們。假若他們要担任遠征的工作，因而使他們可能獲得光榮和聲望，那麼庫中就沒有他們所需的經費，倉中好沒有他們所需的米糧。假使有些多餘的經費和米糧，那也完全用來供應岑（毓英）自已的隊伍。雖然極端關心個人的安危是岑（毓英）最大的缺陷，他却表現他自已是個精明的行政官和能幹的將領。他的話很少可以信任的，這種情任已爲不只一次的可怕事實所證明了。還有他似乎很迷信。據說有一次他活埋了一個可憐的侏儒，因爲有一個備他諮詢的預言家，把當時皇帝軍隊的惡運歸罪於城中出現的這個可憐人的身上。據貝克先生說，另外有一次，岑（毓英）的軍隊駐紮在一患瘟疫的城中，開始受到瘟疫的傳染。岑（毓英）把這項瘟疫歸罪於惡魔，決定在駐紮時期內來解救這城中的災難。由於他的命令，除去一座城門外，其餘的全都關上，又叫許多士兵在每個空曠的地區向空中亂砍，因認爲這些惡魔可能在這些地方潛伏着。於是這些士兵排成隊伍，從對面的城牆朝着那座敞開的城門推進，想用這種方法將他們面前的隱形敵人趕出去。因爲他們假定能把敵人從敞開的城門口趕出去，他們剛推進到城門時，馬上把牠關上，並叫一個衛兵在城上留守。

大力向大理推進的準備已於一八六七年佈置就緒。第二年的初春，馬如龍由省城出發，出發時所有重要官員都護送到城門，並且有很多羣衆圍觀。這時有一支從大理開來的軍隊和他在路上遭遇。和這支軍隊同行的是一支西部邊疆民族所組成的別動隊，這些邊疆民族或是屬於藏族的，由於對中國政府的仇恨，和回民暫時取得聯盟。馬（如龍）成功的希望並不大。他的隊伍的一

部份由徵募來的漢人組成，沒有作戰的意志，其餘的回民盡係勇敢和老練的士兵，不過這批士兵倒是同情敵人，對他們的作戰目的反而不贊同。當兩軍遭遇時，雙方的前哨部隊只要一有機會便表示親善。企圖誘惑帝國軍隊倒戈的事件也發生了；馬（如龍）因此担心他的一部份隊伍會叛變。他決定試試一種策略的效用。雖然他親自率領隊伍，但對敵人的襲擊却毫無結果，他自己反因而受傷。於是他決定撤退。這次撤退很快的變成潰敗。那唯一狹窄的退路被前邊的士兵所阻塞，許多逃亡者躲入鄉村隱藏起來，後來被他們的追擊者所趕出殺戮了。失敗的消息使雲南府的居民大爲震驚，大難臨頭的恐懼倒不及懷疑（馬如龍）叛國的那麼重要。他們如此堅決相信馬（如龍）的勇敢，以致他們深信他定是故意的吃了敗仗。

杜文秀的軍隊所向無阻的往雲南府推進，並且在城外佔領了據點。接着是個長時期的包圍。這座城池非常堅固，不易攻打下來；圍攻者也不能使牠陷於飢荒，因爲除去一個短時期外，他們不能把該城的四週完全封鎖。有一時期城裏的回軍中曾有一危險的陰謀。但馬如龍却立刻把和這陰謀有關的三十多個在他屬下的官員，予以逮捕和處死；另外一些同謀者，因恐遭到同樣的結局，從城中逃出。這種嚴厲的措施旣清除了守軍中的危險分子，也恢復了人民的信心。經過一相當的時期，圍城的隊伍也逐漸因疾病和逃亡而削弱了。他們的軍力越衰弱，他們所受敵人突擊的煩擾也就越多。最後鑒於佔領該城的絕望，他們解圍撤退了。正在圍城的期間，斯萊登少校和安得遜博士從緬甸到了雲南。在猛緬時他們聽到雲南府已被佔領的消息。這件消息的謬誤似乎從未被安得遜博士所發覺，因此在他書中仍把該城的佔領記載下來。

雲南府和牠的四周又一次的沒有敵人的蹤跡了。但全省其餘的城鎭幾乎完全被叛軍佔領。因此需要馬如龍和岑毓英的軍隊全力來進行許多小規模的戰役。有一次戰鬥中，馬如龍被刺傷腿部，倒在火燄瀰漫的地面上，以致他的戰友們不能在深夜以前把他救出。現在有兩件事發生，牠們主要的作用是爲未來的成功鋪平了道路。有一支漢軍在南部的一個縣份把回軍趕走，該縣擁有一些重要鹽井，因此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也由叛軍轉移到政府的手中了。其次滿清皇帝能够從其他省份挪用每月六萬兩（銀子），作爲供給雲南政府的一項補助金。憑着這批錢，軍隊的給養是比較改善了些，也可購買一定數量的外國軍火了。直到那時漢軍所有的武器僅係中國的火繩鎗，這種鎗的性能比從緬甸購得的歐洲老式短鎗差多了，大理回軍中倒有許多使用這種短鎗的。

就在這時羅舍先生到了雲南。因爲他親蒞其境，他把當時作戰的軍隊作了一番奇異的描述。漢軍是由未經訓練的烏合之衆所組成的，除去他們的直屬上司外，不聽從其他任何人的指揮。他們主要的武器是刀和矛，還拔出來的優良士兵攜有他們首領所供給的鎗砲。他們穿的軍服是各種顏色的，軍服之外套着一種護身甲胄。這甲胄是棉製背心式的，有一兩寸厚，裏面是用絲或他種質料填塞的，有時外面還爲少量的銅質或銀質的金屬所遮蔽。他們頭上戴着皮製便帽，上面經常掛着一隻帽纓，爲的是閃躲軍刀的砍擊。他們脚上穿着草鞋，用棉製的綳帶來裹腿，當政府軍的經費比較充足時，常依工作的艱難情形，頒發幾百兩銀子，作爲攻克某些地點的犒賞。這種犒賞是一種習俗，尤其當戰爭快結束時，更成爲普遍的風氣了。於是一營士兵担任攻擊的工作。當牠前進攻擊時，其餘的軍隊只在旁觀望，不予任何援助。假若進攻失敗了，另外一支軍隊就上去接替，或者接着也被殲滅了。這種指揮術常造成生命的嚴重損失，或甚至全部死亡，假若進攻的軍隊獲得適當的支援，那他們的行動就非常容易了。

（三）

馬加龍和岑毓英仍在省的東南部指揮作戰的時候，那重新攻佔鹽井區的楊玉科將軍在西部有了很大的進展。鹽井的佔領使他維持軍隊的經費有了固定的來源，因爲金錢做軍餉的情形在中國比別處更顯著些，所以他能打倒所有的敵人。他逐步向前推進，慢慢的佔領了直通大理大道的所有沿線城鎭。有些次圍攻城鎭曾費了幾個月的功夫，但從未被打退。一個堡壘攻下了，馬上再攻第二個。杜文秀似乎喪失了他從前卓越的能力，對被圍的城鎭不能加以援助。或是他的資源已經枯竭。在他極端困難時他曾企圖得到外國强權的保護。數年前當他的勢力興盛的時候，對於未獲准許訪問大理的葛尼爾中尉表示冷漠，儘管葛中尉自稱他是代表法國政府來旅行的。從印度同時來的斯萊登少校，雖然受到殷懃的款待，並且他確信回民亟願鼓勵通過緬甸與印度貿易；也不准越過邊境猛緬的範圍。現在杜文秀於一八七一年表示願意做英王的臣屬。爲了這個目的他派遣使臣去英國，帶着那遮蔽大理城的神聖山嶺的四周岩山殘片，作爲歸順的象徵。別的考慮不談，和中國的條約關係使（英國）不可能接受這項貢獻。在使臣回國之前，大理王國已不復存在了。

一八七二年初，楊玉科已經攻克大道沿線的最後堡壘，並且立刻到達大理的附近。就在這裏他的進程在一段時間內又受阻了。大理是一具有巨大軍事實力的據點。大理位於一大湖泊西岸的一橢圓形的平原上，背面有高聳的大山綿亙着，山頂爲雪所蓋，軍隊是不能通過的。這山脈於平原的兩端都接近大湖，只有一個狹窄的關口，而且爲一堅强防衛的城鎭所盤踞。這平原，

有十八哩長，三哩寬，擁有雲南最肥沃的稻田。這湖是很深的，能供應無窮盡的魚類。因此這座城池保證不會有因飢荒而投降的可能。在被圍期間，居民照常活動着，繼續耕種田地和進行尋常的營業，平原的兩端的堡壘，即所謂「上關和下關」，是為少數軍隊保衛着。從雲南府通西部的大道是穿過下關，出下關後繼續向南。楊玉科到了這個地點後，看清強力衝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平靜的將軍隊駐紮在守軍砲火射程以外的湖邊，等待時機再行活動。

守下關的回軍將領名董飛龍，是特別被選出來担任這重要職務，他是被認為最可靠的人。杜文秀聽到董飛龍和漢軍串通的傳聞不只一次。但是「上帝要毀滅一個人時，總是先叫他發狂。」這位蘇丹拒絕聽信這種傳聞，及譴責報告人妒忌這位將領，並侮蔑的將他們從他面前趕走。在楊玉科抵達該地數月之後，最後有一個早晨，中國的旗子飄揚於堅固下關城牆之上了。董飛龍獻城門予戰勝者並和他們媾和。大理的險要就這樣未經一戰的易了手。回民大呼叛逆並匆忙的武裝起來，但阻擋敵人的進襲已太遲了。楊玉科進行他的成功事業表現得從容不迫。他的隊伍在平原上列隊而行，在城門附近建立陣地。只要他們看到有利的機會，便攻佔一些小村落，使他們的陣線向前推進了幾百碼。但他們大半仍採用守勢，對於敵人短時間的猛烈攻擊，則進行堅決抵抗。正在這時有一急電送到岑毓英處，內中稱，假若他願在佔領叛軍首府時則親臨前線，就請他早日到來。岑（毓英）早擬於戰爭快完成任務時親臨前線，於是盡速辦完他的公務，馳往大理，到達後他看到漢軍的前哨部隊已推進到距城一哩範圍之內了。馬如龍此刻準備遠征西南部，這個任務是皇帝特別指定由他担任的，他攻取遠離西部大道以南的城鎮。不讓他担任處置杜文秀的工作，或者是認為這樣做比較好些，或者是他情願如此的緣故。

大理城內討論投降問題是非常激烈的。一派力陳抵抗已無可能，另一派則以敵人的信用不可靠。最後主張和平的佔了優勢，於是這一派的首腦人物被舉出進行談判。城牆上懸起停戰旗，在該旗幟保護下，代表們請求謁見楊玉科。這位漢軍將領殷勤的招待他們。他表示這件事必須先向本省巡撫岑毓英請示，因為岑是他的上司。雖然（談判中協議）某些重要人物必須處死，但一般條件是比較緩和的。第二天代表又來，他們聽到巡撫只要杜文秀一人的生命便滿意了；但該城對戰費必須繳出相當數目的賠欵。假若代表們能促使談判成功，保證他們可以担任皇帝指派的官職。他們回城之後，又開始激烈的討論。杜文秀雖是疲倦和失望，倒願為他的屬臣獻出他的生命；主和派又繼續進行談判。大理的玉璽被送往楊玉科處，作為接受了條件的標記；（代表們）又對他說杜文秀即將自首。

一八七三年正月十五日杜文秀穿上他的黃袍。所有貴重的珍寶在前一晚都被毀壞或投入湖中。於是他的夫人和年長的公子們都在他面前自殺。這是他自己死亡的悲慘前奏曲；但他們這樣死還是比落在敵人手中好些。當預定的時間來到時，他由寓所走進演講的大廳，有代表們在那裏接待他，並已為他的離去佈置好一切。登上他的轎子，就被抬出那不再屬於他的宮殿。他緩慢的而且困難的穿過街市前進。因為被他的成千累萬的屬民所擁擠着，這些人們痛哭流涕的願向他們的王子作最後一次的朝拜。在這緊張的時間內，他過去的缺點都被忘記了，只有他的功績還被記憶着。當大家想到他在這種悲壯情景下最後永別的時候，他們的心都快碎了。到達城門時他叫抬轎的停止一下，下轎後，對於人民熱愛他的遊行表感謝並與他們道別。登轎後，他就很快的被抬到楊玉科營盤去了。這裏他受着尊敬的接待。他被問了幾個問題，但他顯然因為困擾太甚，不能作答。不久發覺在離開宮殿前他已服毒藥。他確實只能作一簡單的請求，就是請勝利者要「愛惜人民」。這崇高的詞句是他最後所說的。他又被安置在他的轎上，抬往後方數哩的岑毓英的營盤去了。當他到達那裏時，他已毫無知覺，幾分鐘後他便斷了氣。第二天早晨他的首級被取下，由專差送往雲南府。在那裏他的頭顱被封藏在一蜜罐中，凱旋的運往北京。

六天以後，楊玉科佔領大理。在強大隊伍護衛下，他在那空虛的宮殿中安置下來，回民的代表們為他準備了居室。這些代表們又為迎接其餘部隊進行佈置，部隊到後分駐在居民家中，每家四人。佔領後第十一天岑毓英也進入城內，舉行一個宴會，慶祝該城的佔領。在被邀請赴宴中有十七位重要回民領袖。他們之中那些反對投降者是不願意出席的，生怕會陷入羅網，但更怕因不來會冒犯了（勝利者）。那些代表們却正相反，是無所恐懼的，並且得意的穿上他們的新制服。當這批客人聚集在一起而且到達宴會大廳的入口時，主人作了個暗號。他的衛隊衝進來逮捕這些回民領袖；十七隻頭顱立刻滾在地上。那些主張接受投降條件的和其餘的一齊被屠殺了。他們的懦怯和自私的遺棄他們的王子，結果仍是毫無所獲。同時受驚嚇的居民聽到六次連續的大砲聲。幾乎在他們剛要思索之前，他們就明白了這砲聲的意義。牠是大屠殺的信號。士兵馬上衝向居民，殘忍的屠殺他們。從岑（毓英）推行這恐怖計劃的方式中，表現出他的兇惡的智巧。從佔領開始已有十天過去了，居民漸漸的放棄猜忌心理並且又恢復了他們的日常營業，也打消保衛自己的念頭了。在這種情形下，有效的抵抗是不可能了。有一五百人的團體報告說當時有五千居民遭到優勢部隊的攻擊，並被追擊到湖邊，悉數被迫投入湖中。屠殺一直到天黑才暫時緩和一些。深夜時有五六千果敢的人們聚集一起，黎

明時他們穿過敵人陣地殺出一條路來。自從該城被佔領後，下關便無衛兵把守，因此當他們衝到那個城門時，便逃往二十五哩以外的蒙去化了。同時屠殺仍在城郊及附近村落進行着。士兵放火焚燒屋舍並將企圖逃亡的人們盡行殺死。第三天終了時，在五萬居民中有三萬人被殺，剩下的也被由他們的家中驅逐出去。大理的淪陷是戰爭的終結。少數城鎮仍在抵抗，但不久都被佔領了。在這些城鎮中，蒙化是逃亡者匯集的地點。後來蒙化的人們毀滅了聚集起來的財寶，毒死他們的妻子，縱火燒城，不久後也投降了。於是城門大開。少數人逃往山中，但其餘的不是被火燒死便是落於敵人之手。

叛亂的故事是完結了。但在結束前，對於重要角色以後的歷史，我必須再叙述一下。

馬德新在一八六二年担任短期總督職務後，仍留居雲南府，過着純粹退休的生活，他不僅和馬如龍而且與淡人當局都保持友善的關係。數年以後，當他獲得政府的准許時，便離開雲南府，前往不遠的小鎮友人處居住。一八七四年馬如龍往北京覲見皇帝，岑毓英抓着這個機會向一綑要的回民復仇。在他的命令下，還無過的年已八十一歲的老馬德新忽然被捕和判處死刑，事前顯然的是沒有人控訴過他，也未經過任何種類的審問過程。關於這殘酷的事績，羅舍先生沒有叙述，我也不能探知其詳情。不過我在最後幾天中找到一項有關這事件可靠的參考文件，牠是最近一位雲南旅行者寫成的筆記。筆者遇到一位名叫馬忠的總兵，他是個雲南著名的人物。因爲筆者曾婉轉的指出，就是他於一八七四年把雲南回民的領袖「取消」了。

馬如龍是比他的老友和導師幸運些。到達北京時，他受到朝廷寵幸的款待。他在太后大壽時曾被邀入宮中看戲，因此感到無上的光榮。同時他被調往担任湖南的提督。一八七八年他蒙賜准退休。

現在岑毓英担任雲貴總督的職位已許多年了，在女皇（指西太后——譯者）寵幸下和一般的評價下，他享有很高的名望。在東京（越南地名——譯者）攻擊法人未獲成功一事據說是減低了他的威望。但實際上這件事只有很小的影響。他似乎大有傳奇的聲譽。譬如幾月以前有一位他的屬僚在一個外國人面前把他描述成爲「一個既能文又能武的人，出外如在家，是着高靴便能飛簷走壁。」

閩浙贛省的紅色省城——葛源

——老根據地訪問記之一——

王重民

葛源作了四年（一九三〇——三四）的閩浙贛蘇區省城，受了黨、政、軍的直接領導，教育和保護，也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野蠻的燒殺，搗毀和轟炸。這樣，在政治上造成了它的光輝領導地位，在戰鬥上留下了它的英雄事蹟。談到閩浙贛革命歷史，葛源一定要佔很重要的一頁。

葛源在橫峯縣北部萬山環繞着的一塊周圍二十多里的小平原上，土地肥沃，農產物豐富。一九三〇年十月建立紅色省城以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鬥爭了地主和土豪，貧僱農平均分得了土地。農民們已經富足起來，並且認識了自己政權的好處，一致全心全意的擁護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擁護工農紅軍！這都是它被選作紅色省城的優越條件。

當我們訪問團踏進葛源鎮口的時候，首先送進我們眼睛的是：「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分校」的大門。西邊牆壁上寫着「造成紅軍鐵軍骨幹，爭取革命戰爭勝利」。在偉大的土地革命時期，黨政和全體革命人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造成「紅軍鐵軍」，打倒反革命，爭取革命戰爭勝利。那時候的整個精神，立時啓示給我們了。那十六個字的標語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用白堊掩藏起來，現在又洗刷出來，鋪成紅字，越顯得光輝萬丈。正如經過長征的工農紅軍，現在穿上極漂亮的人民解放軍服裝，回到母校的校門，向我們參觀的人表現出無限的勝利。進了鎮，我們繞遍了大街小巷，徧尋閩浙贛省黨政軍以及各羣衆機關的遺址。我們尋訪瞻仰過的有：中國共產黨省委會、閩省委會，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方志敏主席住過的房子，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區司令部）、消費合作社、列寧師範學校、反帝擁蘇大同盟、和革命互濟會。有的全部燒燬，有的部份房屋摧毀，可是處處牆壁上都有一些被塗掩過的標語，現在抬起頭來，向我們講說當時的革命政策。我們住在省立醫院舊址，（現爲小學校）後面是省立公園，前面是幾棟很高大的破屋，是由匪軍的燒劫或匪機的轟炸造成的。一隻孤立着的石柱或一堵峭立着的頹垣，

都還在挺胸怒目，表示着不屈服的英姿。葛源在紅軍抗日北上前後，的確受了傷，爲紅色政權流過血，但是它是受過共產黨教育的，緊抱着自己的傷痕絕不呻吟，只有痛恨，只有鬥爭，在痛恨和鬥爭的怒火中，有時也在回憶到自己光榮歷史的微笑中得到一些安慰。

閩浙贛省的工農紅軍是在幾次遠征和攻打河口攻打葛源等戰役中壯大起來的。葛源建立爲紅色省城了，紅十軍也雄壯的成立起來了。葛源人民是怎樣的歡慶呀！從此，紅軍一度出征有一度的歡送，送軍鞋呀！送肥豬呀！送鷄子、米酒……呀；一次勝利有一次的歡迎，慰勞和慶祝，開晚會呀！唱歌曲！演話劇呀，人山人海，徹夜的狂歡呀！

黨的全省代表大會，省的工農兵代表大會，積極份子大會，以及五一勞動，十月革命等慶祝大會，都是在葛源舉行，每一個大會的熱潮，都直接和葛源人民的心靈交響着。他們眞心擁護黨，他們眞心擁護人民的政權，凡是鬧各種大會的時候，他們是比過節過年還歡樂的。

葛源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很高的，羣衆組織是健全的，積極的。如工會，婦女會，革命互濟會，反帝擁蘇大同盟，不但作了救濟工作，支援工作，還和軍隊一同行動起來。一九三二年紅十軍和中央紅軍會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和國民黨賣國集團的出賣中國，益使老蘇區的人民忍無可忍了，唯一的希望，只有增强自己的戰鬥力，打垮賣國集團的反動軍隊，早些實現北上抗日。三三年十月十二日，葛源反帝擁蘇團要武裝開赴前線了，這一次的歡送，更是格外的狂熱。

消費合作社的舊址現在又成立了新合作社。當年和現在一樣，是由人民自己組織來打消中間剝削的合作社團，實在也掌握了國家經濟政策。凡紅色區內受國民黨反動派封鎖了的貨品，如布疋食鹽，通過貿易處源源而來，對社員普遍的實行配售。這樣就不但貨價便宜，而且必需品永遠沒有缺少過。當時還有一個特點，除了供給食品和日用必需品，還供給精神食粮——閩浙贛省的各項出版品。在那時候，你若走進葛源的消費合作社，就能看到買到，閩浙贛省機關報「紅色東北」，是石印對開本一大張，遇到慶祝節日，用紅色刷印，極鮮艷引人注目。黨委會的「突擊」和「黨的生活」，團委會的「靑年實話」和「團的建設」，紅軍政治部的「前線」的互濟會的「互濟生活」，都是極普遍的定期刊物。「工農讀本」也到處在合作社可以買到。「工農讀本」曾大量的出版，在列寧小學都是發給工農軍屬子弟，不收費的。

省蘇教育部衛生部的工作，主要是面向農村 。督促鄉或村限期成立列寧小學啦，勸告成立夜校識字班啦。還把一些文化程度較好的調來葛源集訓，提高師資的文化水平。又派人到鄉下巡視，檢查他們教學成績，發動他們向羣衆深入宣傳。衛生部工作人員，也一樣的宣傳衛生常識，發動撲滅蚊蠅。

方志敏主席的政策，把對白區和白軍看成極重要的工作。白軍兵士們受不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剝削壓迫，紛紛來投降，軍區招待處都是好好招待他們的。葛源人民深深了解方主席的政策，也就熱情支持方主席的政策。「紅色東北」第四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公佈的招待白軍禮品有：

葛源送來肥豬一隻。

葛源區第一鄉送來豬肉十六斤，蘿蔔一百斤。

葛源區考坑鄉送來青菜三十三斤。

葛源區婦女送來鷄子一百個，花生豆子十一斤，小菜十一斤。

葛源區第四鄉婦女送來鷄子一百〇六個，凍米糕一百三十六封。

葛源區送來靑菜三百斤。

我舉出這個例子，是想說明葛源人民怎樣了解政府的政策，怎樣響應政府的號召，不是想說明他們怎樣勇於捐獻。若想知道他們捐獻的高潮，是當他們歡送紅軍出征的時候，一送軍鞋就是八百雙，一送肥豬就是三十口。

一九三四年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快要準備出發了，不抗日的國民黨飛機天天「光臨」葛源，紅色省城暫從葛源移到西南五里的楓樹塢。我訪問楓樹塢的時候，從頹垣破壁上的標語，得到當時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答覆，是：

「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

「澈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

「擁護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積極作戰配合全國紅軍的勝利！」

「實現蘇維埃新中國！」

「蘇維埃新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眞的實現了，而且正式成立將近兩年，已經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國了。葛源人民見了我們訪問團，拿出比當年還要高漲的熱情來歡迎我們，高呼：

感謝中央人民政府的關懷！

感謝中共中央的關懷！

感謝毛主席的關懷！

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萬歲！

一九五一年九月

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續）

張政烺

五 「軍事的民主政治」與「宗法封建」

氏族發展到部族聯合，進一步要走上政治的社會，一般的都要經過一個「二權政府」的階段，一方面酋長會議管民政，一方面軍務總指揮官管軍事司法和宗教等事，這便是所謂「軍事的民主政治」。在這一過渡時期，酋長會議的權力日趨削弱以至於消滅，同時，軍務總指揮官的權力逐漸澎漲，便變成了階級社會的元首（在中國便是專制的帝王）。古代中國在十進制氏族組織下，酋長會議便是百姓（百族的酋長）的大會，這在上節已舉過一些史料，雖然不算很豐富卻毫無理由可以懷疑其存在。三代的「王」，禮運稱爲「三代之英」，意謂「俊選之尤者」，我們用現代術語來解釋便是本部族的領袖軍務酋長又兼任了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以下領按照這一看法將所有的史料作一簡單的說明。

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首先用北美洲易洛魁部族聯合的二頭軍務總指揮官來解釋堯舜禹等的禪讓問題，這是中國新史學上一大發明。易洛魁聯合中的二頭軍務總指揮官是處在這一制度的發生和成長階段，而舜禹之事已是這一制度的破壞時期。孟子萬章上：

> 昔者堯薦舜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
>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這裏說「天下諸侯朝覲者」便是部族聯合擁護他作軍務總指揮官。當時在制度上有很大的變動。本來軍務總指揮官是二頭，正死副繼，彼此同時存在可以互相監督，充分的發揮民主精神，此後改爲一頭便容易走上專制的道路。本來二頭軍務總指揮官是由各族中選出，此後卻由夏后氏族世襲了。不過這一轉變無疑的是經過民意的，所以孔子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關於夏代缺乏可信的史料。大約夏王是本部族的領袖軍務酋長，兼任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其職務在軍事司法和宗教方面，亦管理一些民政。軍事是本職，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王一些征伐的事情。古代兵刑不分，古書上亦常說「禹作肉刑」。論語說禹「盡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便指着宗教方面的事。又說「盡力乎溝洫」，主要在防除水害，當時雖然工具簡陋，古代中國「協業」的精神（通力合作）實是無比的力量，作些水利工程亦儘有可能。夏小正說「春正月農率均田」，又說「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可見農人的土地不私有，要每年平均分配一次，同時還要同力耕作公田。這與當時的生產力相適合。龍子所說夏代「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的貢法（見孟子滕文公上），卻與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不合，所以絕不會出現。在部族聯合下武力壯大起來，自然要征服一些未加入聯合的部族，要他們朝貢。野蠻時代中級階段從被征服部族徵取貢品主要的不外旣製織物和園藝上的作物，所以尚書禹貢篇裏所說的「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等等，或許倒保存一部分傳說的歷史。這樣，「協業」的力量，再加上貢納制的財富，便出現了古代中國的文明。

史記夏本紀：

> 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

「諸侯多畔夏」指聯合解體，「百姓弗堪」則是部族內部發生問題了。詩經商頌長發說到湯伐桀時的情形道：

>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這用一本生三枝比喻桀和韋顧昆吾的關係，大約這是聯合的殘餘形態，卽夏后氏的死黨了。

湯是商部族的領袖軍務酋長（萬夫長，見前引湯禱於桑林之辭，祈禱正是領袖軍務酋長宗教上的職務。）伐夏放桀以後諸侯服湯，才兼任了部族聯

合的軍務總指揮官，這一職務便永久歸商「王族」內世襲了。世襲的辦法則是「兄終弟及」，這是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必須通過一定的民主選舉的形式，關於這一點孔子還明瞭，他說：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論語、憲問。）

這是說舊君死後醞釀選舉有三年無君的時期（類似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從元代初年見到。），所以百官要聽命於冢宰。所謂「冢宰」相當於堯時之舜，舜時之禹，禹時之益的身分，不過繼位者已不是冢宰，而常常是舊君的兄弟了。尚書無逸篇說到商代的先王高宗（武丁）「舊勞于外，爰曁小人」，祖甲（疑是太甲，當列武丁之前，參考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接著又說：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可見在兄終弟及的時代，商王即位以前只是普通人，參加農業生產，並無甚麼特殊身分，要到當選以後才繼位稱王。自從康丁以後王位改由父死子繼，這才開始「立王生則逸」，不問生產只貪玩樂，奴隸勞動亦便慢慢出現了。

殷虛的考古發掘工作得到了長形家屋的基址五十餘座，以中間一個最大的黃土台基爲中心，東西對稱，密集的排列在一處。這僅是久經洹水破壞後殘餘的部分，當時的規模當然不止於此。長屋普通寬八至十公尺，長三十公尺，最長的到六十公尺。大約是木建築，所以牆壁和頂蓋一概不存。從這些遺址上，我們可以推想出殷部族的戰士聚族而居的壯大的場面。當時的領袖軍務酋長在出兵作戰時當然有絕對的權力，但在定謀決策時却要開會徵詢衆人的意見。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說：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或許便指的這種會議的功用。這裏解釋一個成語，甲骨文裏有關征伐的卜辭常說「下上若」或「下上弗若」，如

口酉卜，王征舌方，下上若，受我祐。

貞勿征舌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祐。鐵二四四，二（武丁時）

「若」就是「順」，這說明吉利。相反的，「弗若」便凶了。關於「下上」過去學者間沒有一致的解釋，今按上指天道，下指人言。春秋穀梁傳莊公元年：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這段文章很難懂，但是明白的指出了天和人對立，和「下上不若」的厲害。古人常說「師衆以順爲武」（國語晉語）所以在出征時不僅要卜天意，亦要考慮到「人和」了。這類軍事上的民主作風在周代亦還保存，周易蒙卦象傳：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這和上引卜辭意思相同。又同人卦（摘引，經傳不別。）：

同人于野。……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即圖騰。）……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就是開會，「同人于宗」當然是氏族的會議，按照一般野蠻人開會的習慣，號咷是反對，而笑便是同意通過了。

從史記殷本紀亦可以看到商代部族聯合的情形，摘述如下：

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

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

這說明商本來是個部族，基層組織是百姓，湯以下才作部族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又

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大戊，殷復興，諸侯歸之。

帝陽甲之時殷衰，……於是諸侯莫朝。

帝盤庚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我們看雍已以後到大戊，陽甲以後到盤庚，這兩段時間，殷衰諸侯莫朝，可知當時的聯合仍是民主的，商人的領導權並不固定，亦沒有絕對的力量可以控制一切。又

帝辛，……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從這些記載裏還可以看出商王的統治有內外之分，內爲百姓，說明他是部族的領袖軍務酋長。外爲諸侯，說明他是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

古代中國社會在殷周之際又起了一次變化，推動的原因應當是冶鑄青銅技術的由熟練而推廣，這且不談，其表現在社會方面的便是母系氏族消逝和父系家長制出現。簡單的舉例來說，如上文所述「兄終弟及」制到康丁以下四代便變爲「父死子繼」。統治氏族因爲經濟條件優越，常是最進步的形態，一般的氏族則往往要落後一點。甲骨文第一到第四期裏常見一些將官的名字，如吳、㽙、望乘、師般、沚或、……等，難道說他們一生可以七朝（從

武丁到文丁）元老嗎？任憑怎麼壽命長亦決不可能。可見他們都是些軍務酋長，職務永久歸他們一族內世襲，便都頂替着原有的氏族名字。但是到第五期甲骨文裏這些名字却絕對不見了。可見商末和王族繼承制度改變相應的，各氏族的軍務酋長世襲方法亦有了改變。換句話說，就是這些母系氏族一齊垮台了。在這一轉變中給商紂王增加了許多罪名，尙書微子篇說「咈其耇長舊有位人」，牧誓篇說「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都指的這類事情。時代永遠是向前進的，但是在舊勢力太深厚的地方不容易建立起新制度，前進的人物却往往成了犧牲品。古人講「易姓改物」，就是說統治氏族不換便不可能改革。中國史上社會變革往往便是政事治亂朝代更迭的關頭，就是這種原因。試想在這樣大的社會轉變中不能建立起一套新秩序，夫婦、兄弟、父子、君臣之間會要多變混亂啊。（關於父系排斥母系的材料在「古代中國的家族形態」一文中說明。）

殷代的銅器銘文常是簡單的圖形文字，郭沫若先生認爲圖騰的遺迹，這是完全正確的。郭先生說：

凡圖形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原始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已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册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

古代中國能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即脫離母系社會而步入父系家長制，這一蛻變時則大體說來便在周初了。

周代的新制度起自文王成於周公，首先便是確定父系，排斥母系。尙書康誥裏有一段論到殷遺民滅亂天倫的話。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祇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殷末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兩種制度的衝突，大概到處都演着骨肉間鬥爭的局面，並且成爲社會上的一種風氣，無法制止。周人看到這種慘痛的教訓，趁着族中人口還不甚多，產業還不甚發達的時候，便確定下了進步的父子繼承的制度。武王崩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又演出了管蔡霍三叔之變。到周公歸政成王，於是在文王作罰，周公作則的教育下，父子世襲的辦法才慢慢的建立起來了。

周武王是部族的領袖軍務酋長兼任部族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這從前引尙書牧誓篇看得很清楚，伐紂以後造成了部族聯合征服部族聯合的局面。當時只是軍事勝利了，把局面弄得很開展，還沒走上政治的社會，不可能有眞正的國家組織出現。因此，在疆土上有畿服內外的分別，畿內是周王直接管理的區域，自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系統，仍是軍事民主主義的形式。在父系家長制初期，限於生產力，奴隸的發展是很慢的，還不能起質的變化，所以大體說來還應當劃在氏族社會。至於畿外，即東方廣大被征服地區，則只有利用原有的氏族的組織來進行統治。這約有兩種方法，即1立「監」，2建「候」。立監是不破壞原有的氏族的組織，保存原有的最高酋長，僅由周王派遣王族作監督，而單以獲得貢物爲滿足。建候是立監進一步的發展，周王派遣王族（或貴戚）到被征服的地區，代替原有的統治氏族，結合殘餘的氏族的組織，鞏固並擴大領土，成爲軍事殖民地。這兩種辦法對被征服者都保存了基本的氏族組織，所不同的，前者是間接剝削和統治，除定期交出一定的貢納品外，氏族社會的一切依然保存。後者則是直接剝削和統治，土著的氏族共同體除割讓出許多土地並代耕穫外，軍賦和布縷力役之征皆所不免，政治權則是自上而下的，氏族的民主參政權被壓縮到最低的限度。但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氏族社會的許多特點（如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定期調整等等）亦還依然存在。這是古代中國氏族的組織發展到最高級的構造形態，等待鐵器出現，生產力大革命，這才起了變化。

武王伐紂時隊伍並不壯大，僅相當於諸侯兵會者的十幾分之一，比起紂的兵力更爲懸殊。逸周書作雒篇：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周的控制力量不够，不能破壞殷人的氏族的組織而直接有其地奴其民。只可立紂子祿父維持舊體系，而派管叔蔡叔霍叔來監督殷臣，這便是所謂「三監」。（見尙書大誥序等）究竟西周立過多少「監」，現在不得而知，傳世銅器有史獃簋（陶齋吉金錄卷二第五葉），看形制花紋是西周末期（厲宣前後）所作，銘文有「諸侯諸監」等字，可見當時監的數目猶不很少。左傳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以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這是新舊史學家公認的說明周初封建的最好史料。這些特別提出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被分封給各國是同許多古董實物一樣看待，不僅不是奴隸奴農，且亦不是庶民而是百姓。魯國分到的六族，保存着原有的氏族的組織，在魯國担任官職，左傳定公六年：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周社是周人的社神，亳社是殷人的社神。（殷人起於亳，所以移住的地方都立亳社。）魯公和三桓都出自周王族，所以陽虎和他們盟於周社。魯的「國人」多是殷民六族的後人，到春秋末期還未打破氏族的組織，保存着固有的宗敎信仰，所以陽虎要和他們盟於亳社。衛國是殷的老根據地，殷民七族當然亦是「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並担任職事。唐叔分到的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亦復如此，左傳隱公六年（杜預注）：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强家。）

可見到春秋時九宗五正還是支持晉君的極大力量。這只是一些顯著的例子，周初封建諸侯大概如此。史記周本紀：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這些原始部族對周都是一種朝貢的關係，生產方法順着自然發展却不因周的武力而改變。周王族的勢力一天天的澎漲，殖民地一天天的擴張，許多原始部族便漸歸消滅。於是「諸侯」一詞意義和前代大不相同，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說「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這一觀察很銳敏，大體上講夏商和諸侯還是一種部族聯合的關係，而周的諸侯則是王族的擴大了。

周代確定了父死子繼制度以後，國王即位似乎不經過民主的選擧形式，但是否專憑着世襲權呢？不是的。1他必須得到氏族的承認。2他必須代表氏族的利益。這可以從許多材料上說明。史記周本紀說：

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竹書紀年（晉文侯十年）都記載幽王死後諸侯分別擁立攜王和平王。孟子萬章下：

齊宣王問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周代貴戚之卿相當於氏族的世襲酋長，在國君旣立之後還有這樣大的罷免權力，不承認時便可以「易位」。這樣諸侯立王貴卿易位的擧動，決不是胡來亂來，而是有他禮俗的傳統和理論的根據，前引周禮小司寇「致萬民詢立君」則是他羣衆的基礎。所以我們敢於說一句：周王必是代表氏族的組織下一切成員的利益的。（沒有氏族的庶人和奴隸則不包括在內。）

生產力繼續不斷的發展，奴隸的勞動剩餘增加，手工業和商業都抬頭了，山林陂澤之利便成了嚴重的鬥爭的對象。過去人民所注意的只是可耕的地，由氏族平均分配定期調整。山林陂澤不可耕便由氏族公有，不再分配。現在成了工商業資料的主要來源，大利所在，大小世襲酋長便想打主意獨佔。國語周語下說：

厲始革典。

周厲王是一個很能幹很厲害的人，這從銅器銘文和史記裏都可以看出來。「專利」嚴重的破壞了氏族制度，從此氏族社會便開始急速崩潰。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這裏說厲王無道，被萬民（百姓，即國人。）趕到彘，諸侯分番交代以參預王政。在史記周本紀說：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亦說：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

這都是說厲王被逐後曾出現過半貴族半民主的共和政治，雖然時間不久，可見當時亦還可以有「無君」的政府。這事並不偶然，充分的說明了周王權是些什麼性質。共和時代結束，宣王即位，說明在「專利」鬥爭中王族勝利國人失敗。我們讀變風變雅和左傳，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暴君，許多的暴政，而國人逐君立君亦就時有出現。中國氏族社會就這樣因內部利益不一致而解體，一直到眞正的國家建立後才肅清了殘餘的勢力。（完）

附記：本文原定計劃還有：六、庶人和奴隸，七、結論，兩節。現在因爲作者要到中南區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匆匆出發，沒有時間整理；如果等到五六個月後再繼續登載非常不便，所以暫告結束，不盡之意將來另作專篇發表。謹向讀者道歉，並誠懇的請求給以批評和指敎！

一九五一、十一、於北京大學

唐代兩稅基礎及其牽連的問題（續）

岑仲勉

此外、因兩稅問題而牽起的疑問，隨手所見，並揭出如下：

（一）「地稅」的涵義　開元十三年，詔「元率地稅，以置義倉」（據鞠氏書一二頁引元龜四九〇）。通典六又稱天寶中「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則「地稅」字很像是義倉稅的專名，然其實只信筆偶用而已，試看

貞觀二年，戶尙韓仲良奏，定「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通典一二）。

永徽二年閏九月六日勅，「義倉據地收稅，　實是勞煩」（會要八八）。

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通典一二）。

「凡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種苗頃畝，造青苗簿，諸州以七月已前申尙書省，至徵收時，畝別納粟二升，以爲義倉。」（鞠氏書一五頁引唐六典三）「每歲據青苗徵稅，畝別二升，以爲義倉，以備凶年。」（同上引唐六典三〇）。

假使「地稅」是典制上義倉稅的專名，爲甚麼許多令式，都不簡單地直用「地稅」字樣，而反用繁冗的描寫式敘述？我們現在爲行文利便，稱義倉稅作「地稅」，雖然是無妨，但臨到整個制度討究的時候，如果不涇渭分淸，就很容易引起誤會和混同，以致昧於當年制度的眞相。即如、廣德改元大赦制，「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全唐文四九）。會要八三稱「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唯舊唐書一一作「民戶三丁免一丁庸，租稅依舊每畝二升」，新唐書六只作「戶三丁、免其一庸調」，(11)各書之中，最不同的是全唐文跟會要稱「地稅」，而舊唐書稱「租稅」。我們對此，首須記取，租庸調在舊制本來三事並立，既然免去一丁的「庸調」，尙剩下這一丁的「租」，免或不免，如不在詔內聲明，官民便會發生許多疑惑。依是來推斷，舊唐書作「租稅」是對的；會要的「地稅」，許是「租稅」的誤寫，（現存會要訛文極多）否則「地稅」也指租庸調之「租」，並非指義倉稅之「地稅」。

有人說，義倉稅之「地稅」，畝納二升，歷見於前引貞觀、開元各令式，舊唐書旣說「依舊每畝二升，」那不是會要作「地稅」合而舊唐書作「租稅」錯嗎？殊不知舊制每丁受田百畝，納租二石，是「租」的稅率，原伸每畝二升，唯義倉稅也定畝納二升，數目恰同，所以引起誤會。何況那一個「租」免或不免，赦文內萬不容含混過去嗎。

大抵代、德時期「戶稅」、「地稅」的名稱，已甚自由使用。推原其故，則由於開元中起，「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寖溢，提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非得當時之實，」（語見楊炎疏。）到安、史大亂之後，人口死亡轉徙，軍餉刻不容緩，往日構成租庸調單位之丁，已無可覆，按掌管財政的假使坐待戶籍的從新統計，勢必至束手待斃。唯民居則有戶，農耕則有田，除抓着「戶」、「田」來徵收，再沒有更便利的方法。據戶來征收的，便混稱「戶稅」，據田來征收的，便混稱「地稅」或「地租」、「田租」，從其名義來看，似乎跟亂前供外官月料的「戶稅」，供義倉的「地稅」，可能是同源，但從實質來看，則各有不同的歷史。例如、大歷五年三月京兆府減稅制說：「故重明朝旨，更減田租，……京兆府夏麥、上等每畝稅六升，下等每畝稅四升，荒田開佃者每畝稅二升；秋稅、上等每畝稅五升，下等每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每畝稅二升」，（制詔集一一四）舊唐書一一則題爲「詔定京兆府戶稅」，同一抽科而或稱田租，或稱戶稅，故知這種稅收，實是租庸調的臨時代替品，跟近人所提出「地稅」、「戶稅」，毫無關係。學者們唯泥於亂前的租、係按丁征收，義倉稅係按畝征收，遂誤會舊日的「租」已完全廢去（試檢前引各赦文，　租確未廢）。大歷時代的「田租」即是義倉稅；那曉得這不過名稱的自由使用和制度的隨宜變通呢。由此上推，大歷四年十二月、減京兆府秋稅制：「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府來年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有能開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同上制詔集）所稱「稅地」，應同一樣解釋，(12)胡氏引鞠氏書、「（地稅）原來只是畝稅二升，但到大歷年間，發展到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五升，」(13

）仍然是名稱混同的誤會。鞠氏又說，「在法令中放免賦稅時，租與地稅常常並舉，以爲地稅卽是租，是很大的錯誤。」（同前引一二頁）又須知語言隨時代而轉變，這種區別，雖適用於他所引租庸調未壞以前之神龍、開元各例（同前引一二——三頁），卻未能適用於租庸調已壞之後之稱謂。

更進一步說，凡有關於土地的雜稅，唐人也往往稱作地稅，如舊唐書一一、永泰二年，「五月丙辰，稅青苗地錢使殿中侍御韋光裔諸道稅地廻」，是青苗錢可稱「稅地」。陸贄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議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宣公集二〇）是稅草又可稱地稅。（14）由上可見，「地稅」的涵義甚廣泛，我們如說「義倉或地稅，因而凡稱地稅的皆是義倉稅」，那是不合於邏輯的。

（二）大歷四年的戶稅，是減輕工商業者的担負嗎？詔文說道，「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會要八三）據鞠氏解釋，「工商業者卽有邸店、行鋪及爐冶的人們，無需照以前那樣加本戶二等稅，……爲急謀恢復殘破的社會秩序，淸理戰後各方衰落凋零的經濟組織，對於他們不能不減低稅率。」（同前引二一頁）（15）我覺得詔文的眞義，並不這樣。「此稅數」就是「准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的稅數，（用歐州文字來比擬，也應這樣解釋。）如果照本戶等級來徵收，詔文應該說「依本戶稅數」，不應該說「依此稅數」。我們試看下文，「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可見當日的定制，係避免商人及寄莊、寄住那一輩，比之其他百姓，獲得輕稅不均的利益；後來楊炎奏，「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會要八三。）就執行着這個原則。鞠氏減輕工商業担負的看法，我以爲跟實際恰處於相反的地位。

（三）關於兩稅的文件鞠氏書列舉出楊炎奏疏、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和同年二月十一日起請條，（均見會要八三）他說，「正月的制是一種籠統的制詔，二月的起請條方是由中央規定好」，（同前引二八——三〇頁）那是對的。但有一點，向來沒有得到讀者們的注意，會要先敘建中元年正月五日的赦文，跟着敍二月十一日的起請條，隨後才稱「其年八月，宰相楊炎上疏奏曰，……」那末，照文面來看，「其年八月」應該是建中元年的八月了。但德宗更定兩稅，係聽從楊炎的建議，兩稅法已於正、二月頒定，那有再遲六個月楊炎才條上怎樣改定兩稅的道理？今考新唐書七及六二、均稱大歷十四年八月（七日）甲辰，（16）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由這、我們曉得楊炎一作了宰相，馬上就獻議改定兩稅，「其年」本指大歷十四年，編會要的人誤把這一節敍在建中元年之後，就變成事實不可通了。

（四）青苗的名稱　鞠氏說，「大概初期有青苗錢、地頭錢兩種名稱，後來合稱爲青苗錢。」（同前引一九頁）按大中四年（八五〇）正月制雖有「青苗兩稅、本繫田土」的話，（會要八四）但以前不久長慶三年，（八二三）元稹奏、同州田地每畝「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元氏長慶集三八）又會昌三年（八四三）七月八日制，「……今年秋稅及地頭錢宜放免，……秋稅地頭錢量放上供一色」，都沒有說及青苗。更如永泰二年十一月制，「其應徵青苗、地頭錢亦宜三分放一，其先欠永泰元年地頭錢，……並宜放免，」又大歷八年正月制，「其青苗、地頭，天下諸州每畝率錢十五，」（均制詔集一四）或單說地頭，或兼說青苗、地頭，似乎這兩個名稱原來是有區別的。鞠氏說後來合稱爲青苗，也未的確。

結論

由於以上冗長的討論，我們總見得兩稅法係適應當日現實的環境，把租庸調舊制加以錯綜的改進，「丁額不廢」，就是保留着一些殘餘，並不樣鞠氏所說，以「戶稅」、「地稅」構成兩稅法的基礎。

鞠氏說，「我們說兩稅法包括戶稅與地稅，租庸調則併入戶稅」，又說，「舊日的租庸調則歸併到戶稅裏面，這是由於簿籍失修，人戶流亡，……這樣可以免去了每三年團貌的麻煩，同時爲適應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取消不問貧富的以丁担負的租庸調，也是很合理的事，」（同前引三一——二頁）。那些話似乎言之成理。可是、改定了兩稅以後，貞元元年大赦制仍特令各道觀察使倣照貞觀時辦法，自王公以至百姓，據所墾現田畝數，隨納粟豆稻麥作爲義倉的貯備，貞元十年，陸贄又請將稅茶錢來置備義倉，（如果義倉的「地稅」已歸入兩稅，他應該聲明的。）都是義倉「地稅」沒有併入兩稅的鐵證。那末、鞠氏擬爲兩稅基礎的「戶稅」和「地稅」、已然倒了一個。同理、建中初年征得的米一千六百萬石，也不能說是繼承着義倉的「地稅」、而要另找它的祖先；卽是說，除去租庸調的「租」，再沒有別一位能夠具備充任祖先的資格了。依這樣的推論，租庸調的「租」，在兩稅法裏面已占有它的新位置，那能說租庸調都併入戶稅裏面呢？

其次「戶稅」那個名詞，因爲當日沒有別種相類的徵收，還可以應用。獨「地稅」兩字，意義不定相同，爲求免去牽連的誤會，則確屬於義倉的稅收，我提議改用「義倉稅」或「義倉附加稅」一類的名詞，以便識別。

最末、這裏必須補充一句，鞠氏那本著作，搜羅豐富，剖析詳明，確是研究唐代財政史所不可少的參考書；可惜的、他對兩稅的看法，係以「戶稅」、「地稅」爲前提一着旣錯，後來的下子，就未免跟着受刼了。

（一九五一、七、十九、廣州中大。）

稿成後，再檢隋書二四所記北齊制度，它說：「率人一牀，……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二？）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據竹簡齋本）墾租應即唐代的「租」，義租要來備水旱，那末，就是唐代的義倉稅無疑。由是，我們更曉得：（一）唐代的義倉稅，不單是承襲隋制，直是遠溯北齊。北齊受田的虛數，合露田，永業來計，每夫婦一牀、應共一百四十畝，僅納義租五斗，平均每畝不足四合，比之唐代墾田畝納二升，低得多了。（二）義倉稅也有過「租」的名稱。（三）「臺」係指國庫所在地，故下文說，「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是義倉稅之劃入地方支銷，自北齊歷隋而唐，都一貫這樣子辦理。（一九五一、九、一再記。）

（1）鞠氏稱「戶稅的起始不甚明瞭。」（同前引七頁）。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則引隋書食貨志、「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來作說明。（三篇六七頁）。按唐初制度，大致淵源隋代，劉氏所證是對的。唐代外官俸料的來源，據會要九三，在開元十八年以前，改變了好幾次。唯通典六稱，「天寶中（元龜四八七作八載。）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下文又稱「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正跟唐六典三、「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三年一大稅，其率一百五十萬貫，每年一小稅，其率四十萬貫，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每年又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據鞠氏書七——八頁引）數目及用途，大致相合。換句話說，這就是安史亂前「戶稅」支出之指定，（六典於開元二十六年編成）亦即外收外銷之地方稅。

（2）鞠氏說，「義倉既不作賑給之用，而徵收則仍然年年不息，（地稅）當然成為國家正式的稅收，杜佑把牠列為國家財政收入之一，是很合理的。」（同前引一六頁）我們從貞元大赦制來看，義倉稅的「地稅」、並沒有成為國家正式稅收的憑證。（詳見下文）杜佑通典六所記天寶中的稅收，顯係國庫跟地方庫並列（見前注1）。還有、杜佑在「地稅」下注稱：「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約計數，」假使這額「地稅」已變為國庫收入，自有唐代中央度支的細數可查，杜佑何以要根據西漢每戶的墾田，來推測唐朝「地稅」的收額？這樣特殊的敘述，恰恰證明了當日的「地稅」是外收外銷，（地方稅）。不是國家的正稅，所以中央度支無詳案可稽，杜佑也只得約估其收數。

（3）胡氏引文及全唐文四六一均同。唯鞠氏書引文苑英華四二五、唐大詔令六九及陸宣公集制誥二，作「經今六載」，（四〇頁）這是淺人所妄行校改的，試比觀後引宣公集兩節便見。又我的見本叢刊宣公集也作「百年」，不知鞠氏據甚麼本子？

（4）貞元二年、韓滉運米三萬石到陝州，德宗至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的感觸語，這見得長安之需米，是怎樣重要。

（5）這個數比通典九、五〇〇、〇〇〇緡約多一、四〇〇、〇〇〇緡，或連地頭錢等併計在內。

（6）通典六稱，「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現在如依每丁七十畝來計算，則得每畝租約三升。

（7）劉不同引舊唐書四八大、和四年五月，西川宣撫使崔戎奏請兩稅錢數內一分折納匹段，以證「租調制度自始即有折納之規定，」（同前引五〇頁）是沒有注意到歷史的時間性，因為計到文宗大和四年，（八三〇）租庸調已廢了五十一年了。

（8）鞠氏書以為「開元二十五年令，」（三〇頁）但通典並沒有這樣說，會要八三也未載。據我的推測，應是唐代舊制，劉秩已不知其起年，故通典亦祗得從闕，必非開元末始行規定。試看會要八三稱，「天寶三載三月二十五日敕文，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以九月三十日為限」，更不見得是改革七年前（開元二十五至天寶三，先後八年。）的規定。

（9）參看拙著張曲江集誥命的說明及證補。

（10）參看拙著續貞石證史。（史語所集刊十五本、二四二——四頁。）

（11）胡氏引會要，以「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為一句，「庸調地稅依舊」為一句，並稱「三丁放一丁、是減免租稅，而庸調地稅依舊。」但依新唐書所引，胡氏顯係誤讀，「庸調」應屬上為一句；而且「租」、「庸」、「調」三事，皆以「丁」為本位，如說「免一丁」便是免「租」，詔文恐怕沒有這樣的矛盾語吧。

（12）此外如「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宣公集二〇）「軍食又取於地租」，「約以年限，免其地租，」（均同上二二）這些「地稅」及「地租」字，均不可泥看。

（13）大約是根據唐代財政史一八頁引冊府元龜，大歷四年十月勅。

（14）胡氏又認稅草是義倉稅的地稅。按稅草早見於儀鳳二年（鞠氏書一二頁引唐大詔令七九）。開元末，李林甫以稅草無定法，與朝集使協議更革，（新唐書五一）詳考記載，義倉稅並無徵納稅草的規定，豈能牽合作一事。而且，為甚麼廣德二年才創立的青苗錢，（新唐書六）也稱作地稅呢？

（15）前引劉不同書六九頁，也有同樣的誤解。

（16）舊唐書一二作「八月庚辰」，是錯的，八月係戊戌朔，月內不得有庚辰。

十六世紀李如松在朝鮮進行的抗日援朝鬥爭

方詩銘

。日本對中國人民的屠殺與掠奪，從十三世紀日本北條氏執政時代開始，一直到十六世紀豐臣秀吉當國時代爲止，前後繼續了三百多年。對於這些日本的流氓强盜，我們歷史上稱爲「倭寇」。

倭寇的殘酷暴行，偏及於我們祖國的沿海，從東北的遼東，經過山東、江南、江北、浙江、福建，一直到華南的廣東。在這個時期的抗倭鬥爭中，英勇的中國人民積極的發揮了他們的力量，予這些無恥侵略者以有力的打擊，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者的英雄事蹟。

十六世紀的日本，從織田信長任「關白」（相當於中國的丞相）的時候開始統一，到了豐臣秀吉（我們歷史上稱之爲「豐秀吉」（一））繼任「關白」，更全部完成了這一個統一的事業。這時日本由分散進入專制主義的封建制度，商業資本有了很大的發展，開始成長的「町人階級」（二）不僅要求和中國通商，而且更積極要求開闢海外的貿易市場。同時日本封建貴族無饜的慾望也廣泛的提高了，他們不僅要求着中國的絹帛瓷器，而且更普遍的要求着一切外國的侈奢品。由於這些「町人階級」和封建貴族的迫切需要，便產生了豐臣秀吉瘋狂的對外侵略行動。這一個侵略行動的目的，包括了琉球、呂宋、台灣、朝鮮的佔領，並且更企圖通過朝鮮的佔領，而侵略我們的祖國。

豐臣秀吉的侵略計劃是這樣的：首先大量的擴充軍備，造了許多的戰艦和大船，用朝鮮人爲嚮導，侵略中國，目標是明帝國的首都——北京。另外用一些中國的漢奸、土匪、强盜、爲嚮導，侵入中國的福建、浙江沿海地區（三）這一個侵略計劃，豐臣秀吉在積極的準備着。

這一個侵略陰謀傳到琉球去了。這時福建同安有一個商人陳甲在那兒經商，他知道了這一個侵略陰謀的消息。陳甲知道豐臣秀吉的侵略計劃要是實現了，對於祖國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他急於要把這個陰謀消息帶到祖國去。經過他和琉球長史鄭迵的商議以後，讓這個時候琉球的進貢請封使把這個消息帶到中國來。陳甲認爲讓琉球使人帶這樣一個重大的陰謀消息，要是他忘記了，或者雖然是已經報告了，但不能十分的詳細，這對於祖國的危害都是很大的，因此他就親自回到故鄉——福建，把豐臣秀吉的陰謀計劃報告給巡撫趙參魯。

朱翊鈞（神宗）知道豐臣秀吉的陰謀計劃，轉告朝鮮國王李昖（宣祖）。李昖是一個荒淫酒色的人，對於這一個陰謀並不重視，只是自己辯白並沒有給日本侵略者作嚮導。因此明朝政府對這件事也就同樣不重視了（四）。

豐臣秀吉積極的準備着陰謀計劃，大量的招兵買馬，積聚着三年的糧食。一五九二年（萬曆二十年）的四月裏，豐臣秀吉大舉侵略，派遣大將清正、行長、義智和玄蘇、宗逸帶領幾百艘戰船，由對馬島渡海，侵佔朝鮮的慶尙道，進攻釜山鎭。到了五月裏，又偷渡臨津，侵佔開城，在這裏燒殺搶掠，高度的發揮了這一隻强盜軍隊的侵略性。這一隻侵略軍隊又分軍侵佔了豐德諸郡。朝鮮的軍隊在李昖腐朽政府的領導下，未能抵抗，一路上望風潰退。日本侵略者的軍隊，在清正這一些强盜頭子的領導下，就進攻王京。七月裏侵佔王京，進攻平壤，在王京大規模的掘發墳墓，搶刼庫藏，一路上又奸淫擄掠，更無恥的積極發揮了侵略軍隊的本質（五）。

在這個時候，朝鮮八道幾乎完全陷落，這是事實；朝鮮八道堅拒，更是事實。像全羅道，節制使權慄戰於珍山郡；黃海道，招討使李廷馣戰於延安城；咸鏡北道，評事鄭文學戰於鏡城等等。或是收到阻敵前進的效果，或是收到了克復城池的效果，或是收到殺敵過當的效果，這都是値得稱述的。至於義軍興起的事實，也很普遍，特別是慶尙、全羅、忠清、京畿四道爲最顯著，有儒生、學論、僧民、退休的官宦等，其中像郭再祐、柳彭老、僧靈主、洪彥秀李男父子及鄭仁弘、金千鎰、趙憲等人都有很好的表現。這種情形，日本帝國主義的著述中也要承認：『於數月間，各操兵聚黨，蜂起於四方。』『自是之後，各道義兵蜂起之舉，不可勝數』（六）；義軍威脅進逼的

牽制了侵略軍隊使『小西行長軍隊以糧食供給不足，且有「土民叛亂」，無辦法，率領部下一萬五千人而與明兵作戰，當時寡不敵衆，不得不過大同江退却，大勢逆轉』（七）。這種人民武裝日漸壯大所起的作用，委實也是不小的。

朝鮮的使者絡繹的向明朝求發救兵，當時朝臣的公議說：『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八）』於是遣行人（官名）薛藩（九）告訴李昖說：大兵十萬就要來援救你們了，我們還通知琉球、暹羅諸國，叫他們出兵去搗倭寇的巢穴（十）。這時日本侵略者的軍隊已經到達平壤，李昖更着急了，就又從義州逃到愛州（十一）。

明朝派遣的援朝軍隊，是遊擊（官名）史儒和遼陽副總兵（官名）祖承訓率領的，在七月十六日，這兩支軍隊就到了平壤，由於霖雨和地利不熟的關係，這次戰役是完全失敗了。史儒戰死，祖承訓僅以身免（十二）。這一個失敗的消息傳到明朝，舉朝震動，除了在登、萊、天津、旅順、淮陽等沿海地區設防外，又出現了主戰主和兩派意見（十三）。

主和派的首領是兵部尚書石星，他任用一個嘉興人沈惟敬到日本侵略軍隊中去探聽消息。沈惟敬本來是一個無賴小人，貪圖厚利，因此反而作了日本侵略者的特務（十四）！

另一派主張派大軍前往援救朝鮮，認爲朝鮮是中國的藩屬，無論如何應該援救，『關白（指豐臣秀吉）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徒鄰鬥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虞，京師鞏于太山矣（十五）。』『倭奴含浙直財帛之藪，畢力朝鮮，蓋欲騁其欺天逆命之圖，非嚼囊鼠竊狗偷可比，向日中外臣工言之詳矣（十六）。』主戰派是澈底明瞭豐臣秀吉的陰謀計劃的。倭寇的侵略朝鮮，就是準備進攻中國，保衛朝鮮，也就是保衛中國，這一個抗日援朝的戰爭完全是正義的。

主戰派的正義救國政策，和主和派的無恥賣國政策，在朝廷內鬥爭着。朱翊鈞動搖不定，大體上是偏重主戰的。在這一年的十二月裏，以李如松爲征東提督，前往朝鮮，領導這一次正義的抗日援朝戰鬥（十七）。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兒子，他的先世本來是朝鮮人，從成梁的高祖李英纔開始到中國來的（十八）。因此這一次李如松來援救朝鮮，也就是保衛他自己的祖國，參加這一次鬥爭的，除了李如松本人外，還有他的弟弟如栢和如梅（十九）。

當一五九二年十二月李如松在佈置軍事的時候，主和派所利用的漢奸特務沈惟敬從日本回來了，他向如松說：倭酋行長願意受封請和，希望明朝的大軍退到平壤以西　以大同江爲界。李如松聽見這一番無恥賣國的話，他氣極了，大罵漢奸沈惟敬說：大兵一到如泰山壓卵，賊亡無日，你還敢說這種話來侮辱我！你卑鄙賣國，罪當斬！參謀（官名）李應試向如松說：我們不如將計就計，假裝答應倭酋請封的話，而暗地進攻，這是一條奇計。如松聽了他的話，把這一個漢奸特務關在營裏，在二十五日誓師渡鴨綠江（二十）。

一五九三年（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大軍進抵肅寧館，倭酋行長派遣一個日本將官叫做吉兵霸三郎的帶着二十一個倭寇，還有一個漢奸翻譯張大膳，一起到了安定，表面上說是來迎接漢奸特務沈惟敬，實際是要來看一看明朝大軍的虛實。如松立刻命令遊擊（官名）李寧把這二十幾個倭寇綑起來，倭寇在一陣格鬥以後逃跑了，僅捕到吉兵霸三郎等三個人，李寧沒有好好的執行命令完成任務，如松把他的處分宣佈全軍，大家看見李將軍執法如山，都不敢再忽視軍令了（二十一）。

在這一月的六日，大軍進抵平壤。平壤的地形東南兩面都面臨大江，西面是上陸山，北面是牡丹臺。牡丹臺是一個又高又險要的地方，倭寇在這裏設有砲臺（二十二）。

當大軍進抵平壤的時候，倭酋行長還以爲是明朝的封使來了，但是大軍却由於沒有立刻進入平壤城，倭寇因此識破了這一條計策，李如松暗地進攻的計劃也就因此完全失敗了（二十三）。

在這一天的夜裏，倭寇的軍隊就襲擊李如栢的軍營，被大軍英勇的擊退了（二十四）。

到了這一月八日黎明的時候，李如松大軍的進攻開始了。如松親自帶着一百多名親兵直抵平壤城下，並且命令大軍圍攻平壤城的西北面，遊擊將軍（官名）吳惟忠、副總兵（官名）査大受攻牡丹峯，中軍（官名）楊元、右協都督（官名）張世爵攻七星門，左協都督（官名）李如栢、參將（官名）李芳春攻普通門，副總兵（官名）祖承勳、遊擊（官名）駱尙志配合着朝鮮的兵使（官名）李鎰、防禦使（官名）金應瑞等攻含毬門。『俄而發大砲一聲，各鎮繼而齊發，響如萬雷，山嶽震搖，亂放火箭，烟燄瀰數十里，咫尺不分，但聞吶喊聲雜於砲響，如蜂鬨鬧』，李如松冒死指揮大軍攻城，倭寇在城上『亂用鉛丸湯水大石滾下拒之』，大軍稍退却，李如松立刻手斬怯退者一人，並且挺身直前大呼着：先登城的賞銀五千兩。『吳惟忠中丸傷胸，策戰益力，駱尙志從含毬門持長戟，負麻牌，聳身攀堞，賊投巨石，撞傷其脚，尙志冒而直上，諸軍鼓譟隨之，賊不敢抵當，浙兵先登，拔賊幟，立天軍（指

明軍）旗靡。」李如松領導着張世爵等攻七星門，『賊拒門樓，未易拔』，李如松『命發大砲攻之，砲二枝著門樓，撞碎倒地，燒盡，』如松遂『整軍而入。諸軍乘勝爭前，騎步雲集，四面斫死，賊勢縮迸入諸幕。』倭酋行長這時躲在練光亭的土窟裏，不敢出來，李如松準備用火攻。七星、普通諸窟的倭寇也仍舊堅守，如松於是『會諸軍仰攻之，賊從中放丸，天兵（指明軍）僵屍相續，』如松『所騎馬中丸。』還營以後，如松『使張大膳諭行長等曰：「以我兵力足以一舉殲滅，而不忍盡殺人命，姑爲退舍，開你生路，速領諸將來詣轅門，聽我分付，不但饒命，當有厚賞。」行長等回報曰：「俺等情願退軍，請勿攔截後面。」』如松允許倭寇退出平壤（二十五）。

這一天夜裏，李如松讓朝鮮的平安兵使李鎰撤去中和一路的朝鮮伏兵。午夜的時候，倭酋行長、玄蘇、義智渡過大同江逃走。中和、黃州一帶的倭寇，聽見平壤明軍和朝鮮軍勝利的砲聲以後，就已經先逃跑了。朝鮮的黃州判官鄭曄給急忙逃命的行長軍隊一個巨大的打擊，斬了九十多名寇兵。倭寇在落荒逃命的時候，一路上騷擾搶刼，朝鮮人民也英勇的予以打擊，又斬了三十多名寇兵（二十六）。

李松如領導的平壤戰役，經過中朝部隊英勇的戰鬥以後，全部勝利結束。總計斬獲一千二百八十五名倭寇，生擒兩名，並且捕得漢奸特務張大膳，奪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解放了給倭寇擄去的朝鮮人民一千二百二十五名（二十七）。

到了這一個月的十九日，李如栢又解放開城，斬寇兵一百六十五名。朝鮮爲日本侵略的地方：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就完全爲中朝部隊英勇的戰鬥所解放了（二十八）。

在這一次戰役裏，中朝部隊發揮了高度的英勇戰鬥精神，宋應昌在致參軍鄭文彬、趙汝梅的書上敘述李如松和李如栢的英勇戰鬥說：倭寇的鳥銃是非常厲害的，但是李如松和他的弟弟如栢却非常英勇的身先士卒，一個給鳥銃擊中盔頂，一個給擊中馬腹。應昌又在辨楊給事疏上說：當攻城的時候，李如松給鳥銃擊中坐馬，馬也倒了，李如栢給擊中盔頂，盔也擊穿了，眞是百死一生，但是他們兄弟兩人仍舊奮不顧身，領導着戰士們去英勇打擊敵人（二十九）。明史李如松傳也說：吳惟忠中砲，血已經從胸前的傷口裏不住的湧出來，但是他仍舊大呼着領導戰鬥。李如[illegible]（三十）的坐馬給砲打死了，他立刻又換上一匹馬，仍舊往來奔馳，馬又墮到陷坑裏去了，但他又英勇的讓馬從陷坑裏跳出來。如松傳裏更說到這一次戰役，『將士無不一當百』，萬曆三大征考裏也說到『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留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

這一次中朝部隊所獲得的平壤大捷，主要的是在這一次戰役裏，中朝部隊的戰鬥是完全正義的，是完全符合當時中朝兩國廣大人民的要求的，所以在戰鬥中，中朝兩國的戰士當然是能『無不一當百』了。相反的，這一次豐臣秀吉所發動的戰爭是侵略的，是爲了少數町人階級和封建地主的利益。所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當然也就在我們這一邊了。

這時倭寇還侵佔着朝鮮的首都——王京，李如松在解放王京的戰役中，在碧蹄館這個地方遭受着很小的一個失敗。由於這次敵我的力量相差過大，李如松所帶領的戰士不過一千人，而倭寇却有三千多人，但是在英勇的戰鬥中，仍舊擊斃了倭寇一百六十多名，而明軍的損失也不過幾百人。這在戰鬥上說並不算是失敗，即使說是失敗，也只能說是一次很小的失敗。但是日本侵略者却故意誇大這一次戰役的失敗，說李如松在戰鬥中有十幾萬名戰士參加，又說在這一次戰鬥中，明軍損失了一萬人（三十二）。我們從當時最正確的記錄看來，日本侵略者的這種記載完全是在無恥的吹牛，是不值我們一駁的。

國內無恥的主和派也盡情的在誇張碧蹄館戰役的失敗，如吏科給事中楊廷蘭的奏疏中，就誣蔑如松說：『碧蹄一戰，戰士損失了一大半，而所報的只有十分之一，他更無恥的誣蔑說：『小勝則虛報爲大，大敗則隱匿爲小。』這種誣蔑誇張不僅是楊廷蘭一個人，而是主和派全部無恥的意見（三十三），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反動統治階級是如何的與廣大人民完全背道而馳的。

碧蹄館戰役以後，李如松駐在開城佈置軍事，命查大受領導着敢死的戰士燒去倭寇在龍山的大量屯粮，倭寇因此乏食。四月十八日，倭寇棄王京逃走，如松乘勝追趕，解放了漢江以南一千多里的廣大地區。這時倭寇勢窮力竭，縮在釜山浦這個小地區內，如松又命水師分佈在釜山海口，斷絕倭寇的交通。眼看着倭寇在中朝人民的有力打擊下就要全部垮臺了（三十四）。

在這個時候，主和派在國內更加無恥的活躍，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說：『我與倭何仇，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取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三十五）。』宋應昌這時雖然竭力說明：倭寇侵略朝鮮，目的實際是在中國，朝鮮的安全國，也就是中國的安全（三十六）。但是昏庸腐朽的明朝政府却聽從了主和派的意見，將大軍從朝鮮撤回中國來，這又一次證明了反動統治統階級是完全和人民背道而馳的。

這一次抗日援朝保家衛國的戰鬥，由於中朝人民的高度英勇和李如松的

有力領導，是完全獲得百分之百的勝利。這一勝利打擊了豐臣秀吉的侵略陰謀，要不是那些無恥反動的主和派在那兒叫囂阻撓的話，這一個侵略陰謀在中朝人民的有力打擊下是會完全粉碎的。

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日本帝國者努役了朝鮮，在今天，美、日帝國主義者勾結起來，又妄想再度奴役朝鮮。今天美帝的侵略陰謀，和十六世紀日本侵略者的狂妄企圖是完全是一樣的，它妄想想通過侵略朝鮮，來侵略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由歷史證明，這一個狂妄無恥的陰謀，在我們中朝人民的英勇打擊下，是會全部粉碎的。

(一)見「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二)就是商人階級。

(三)見「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四)見「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五)見「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卷三二二日本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六)見日林泰輔：朝鮮通史。

(七)見日黑龍會編：日支交涉外史。

(八)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九)此據茅瑞徵瑞：「萬曆大征考」，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作審。

(十)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十一)見「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

(十二)此據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所記與此小異。

(十三)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十四)見「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

(十五)宋應昌奏疏語，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此雖以後在朝鮮所發，但可代表主戰派的意見。

(十六)見趙士楨：「倭情屯田議」。

(十七)見「明史」卷三二〇朝鮮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十八)見「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傳。

(十九)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傳。

(二十)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黃汝亨：「宋應昌行狀」。

(二十一)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二十二)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二十三)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

(二十四)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二十五)見「朝鮮李朝實錄」卷三四宣祖李昖二十七年條。

(二十六)見「朝鮮李朝實錄」卷三四宣祖李昖二十七年條。

(二十七)見「朝鮮李朝實錄」卷三四宣祖李昖二十七年條。

(二十八)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二十九)見所著「經略復國要編」卷五卷七。

(三十)傳中本作如柏，此據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改正。

(三十一)見「朝鮮李朝實錄」卷三五宣祖李昖二十七年條，錢世楨：「征東實紀」。

(三十二)「黑田家譜」、「朝鮮征伐紀」和「征韓錄」無恥的說如松有齎十幾萬名戰士，也許這個謊話自己都知道不能叫人相信，所以在「征韓偉略」裏又忽然減少了八萬名，說如松只有二萬名戰士了！又「日本外史」無耻的誇大說：在這一次戰役中，中國犧牲了一萬名戰士。

(三十三)見宋應昌：「辨楊給事論疏」，刋「經略復國要編」卷七。

(三十四)見「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傳、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三十五)見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

(三十六)同(十五)。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於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問題解答

問： 何謂兩田制、三田制？那一種比較進步？它們的發展情形怎樣？（讀者：何易）

答： （一）兩田制和三田制都是農業上的耕種方式。兩田制是將一定面積的耕地，分爲兩田區，兩年完成輪耕一次，每年僅以一田區栽種穀物，另一田區閒放（休息）。以英國爲例，這種穀物多爲小麥，其情形如左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甲田區	小麥	閒放
乙田區	閒放	小麥

這樣，每輪耕一次，耕地面積的利用率爲百分之五十（詳下）。

同樣，三田制是將一定面積的耕地，分爲三田區，三年完成輪耕一次，每年以兩田區栽種不同種類的穀物，一田區閒放。英國的情形如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甲田區	小麥	閒放	大麥或燕麥
乙田區	大麥或燕麥	小麥	閒放
丙田區	閒放	大麥或燕麥	小麥

每輪耕一次，耕地面積的利用率爲三分之二，卽百分之六六·七（詳下）。

（二）兩田制和三田制比較起來，後者較爲進步，因爲從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上來看，三田制較兩田制爲高。這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一、耕地面積的利用率，三田制高於兩田制。一爲百分之六六·七，一則僅百分之五十。這在兩田區面積相等及三田區面積互等時，自不成問題；卽在各田區面積不等時，也會一樣的。爲易明白起見，特舉下例說明之。

設兩田區總面積爲一百二十畝，三田區的總面積亦爲一二〇畝，而各田區面積不等，在六年中來比較其耕地面積的百分比。（取六年者，以二、三之最小公倍數爲六。）

（甲）兩田制：（1，2，3，——表年數）

	1	2	3	4	5	6
甲田區45畝	穀物	閒放	穀物	閒放	穀物	閒放
乙田區75畝	閒放	穀物	閒放	穀物	閒放	穀物
利用率	37.5%	62.5%	37.5%	62.5%	37.5%	62.5%

說明：利用率卽種穀物之土地佔全面積的百分比。

以每年全面積爲100%，六年爲600%，利用率總和爲300%，故爲總率的一半，卽50%。

以實耕畝數相加，六年爲三六〇畝，亦爲總數七二〇畝之50%。

以兩年輪耕一次完畢時，利用率（與實耕畝數）爲50%。

	1（%）	2（%）	3（%）	4（%）	5（%）	6（%）
甲田區45畝	小麥 37.5%	閒放	大麥或燕麥 37.5%	小麥 37.5%	閒放	大麥或燕麥 37.5%
乙田區39畝	大麥或燕麥 32.5%	小麥 32.5%	閒放	大麥或燕麥 32.5%	小麥 32.5%	閒放
丙田區36畝	閒放	大麥或燕麥 30%	小麥 30%	閒放	大麥或燕麥 30%	小麥 30%
利用率	70%	62.5%	67.5%	70%	62.5%	70%

說明：六年總率爲600%，利用率爲400%，卽三分之二，亦卽66.7%

六年耕地面積爲七二〇畝，實耕面積四八〇畝，故爲全面積的66.7%

三年輪耕完一次時，亦得66.7%。

由上例可知，即耕地劃區不等時，比率仍係一定的。但這樣情形很少見，因每年生產額的總數，要大致相等，不讓一年太多，一年太少，收獲既易受天時影響，而生產額又相差太大時，更易製造危機。所以無論兩田制或三田制，各田區的面積，總是大致相等的。

二、在土壤的利用上，三田制比兩田制進步，三田制是兩田制的自然發展。在同一耕地上，連續種植不同穀物兩年，而又無足够及適合的肥料的情形下，其必要條件是發現不同的穀物，由土中吸取的主要養料不同，因之，在頭年種了一種穀物，次年另一種穀物，仍能生長，小麥和大麥即因取於土壤中的養料各異，而能輪種，兩田制則並未利用到這種的不同。

(三) 兩田制與三田制都是歐洲中古的主要農耕方式，在歐洲延續了一千年之久。三田制發展後，兩田制並未絕跡。在山地及土壤貧瘠的地方，兩田制仍然繼續存在著，因它沒有具備發展爲三田制的條件。相反的，在平原和土壤較肥沃的地方，十二、三世紀後，都已發展爲三田制了。

兩田制和三田制都很浪費。因爲沒有發現適當的施肥方法，使得不同時期栽種及收獲的穀物，能在一年中在同一田區生長，而同種的穀物，又不能連續栽種兩年，且即使栽種不同種類的穀物，土地利用兩年後，地力已盡，不得不休息一年，這樣總是有一部分土地沒有利用來耕種。在嚴寒的冬天，草也難於生長，不但迫使中古的農民，因沒有足够的飼料，必須在冬天殺死大批牛羊，且不能利用草的生長來肥沃土壤。這種不進步的耕種方式，直到十八世紀人工草和耐寒草介紹到歐洲後，才改變了。人工草如苜蓿、濱蒜等，主要是從空氣中吸取養料，可利用之來肥沃土壤，在一種穀物收獲後，即用人工培植在土壤裏，在一定時間後，即可犂入土中，對土壤做了施肥的工作，便能再種穀物了，也不需要兩年或一年必須休耕一次了。耐寒草如蕪菁、恭菜，也用人工灑在土中，能耐寒生長，解決了牛羊冬日的飼料，亦盡了肥沃土壤的功能。因此，十八世紀人工草和耐寒草盛行後，這種中古式的兩田制和三田制便消滅了。

(辜燮高答)

參考書：A. Birni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l, Isles.
J. W. Clapham d Eileen Pow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
大英百科全書 Rotation 條

注意：問題請寄天津六里台南開大學歷史系或歷史教學月刊社轉交中國史學會天津分會。

編後記

本刊爲加强中小學歷史教學參考稿件的編輯工作，希望各地教師多賜予教學經驗、教學計劃、教學方法以及提綱、教案等類文稿。

× × × ×

爲配合近代史的學習，希望各地歷史教學工作者多賜予此類稿件。

× × ×

本刊第一卷第二卷已出各期，讀者紛紛來函詢索，但各期多無存書，所以我們已準備再版各期，訂成合訂本兩冊，訂價每冊一萬七千元，讀者欲購閱，由各地新華登記（不收訂款），在訂數超過一千冊時，本社即可付印。前本刊原定單獨再版數期的計劃，即不再做，希望讀者原諒。

× × × ×

楊生茂先生世界近代史講課紀錄，因本期付印較早，稿件尚未寄來，暫停。

× × × ×

上期本刊出刊時因印刷廠正在趕印華北物資交流大會的書籍，以致誤了幾天，玆附帶聲明，謹請讀者們原諒。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教學的目的和重點

林　幹

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在目前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正在廣泛的和深入的展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和堅決的反對美帝重新武裝日本運動的高潮中，我們講授這一課『反帝』，『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史，無疑的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此我願意把這一課的教學目的和重點提出來和歷史教師們共同研究，並望指正。

（一）教學目的

我以爲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這一課的教學目的主要的是：

（1）使學生認識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推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同時又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保衛者；從而使學生確信中國有了共產黨，就能保證中華民族的獨立，抗拒外來民族的侵略，獲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

（2）使學生認識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始而阻撓發動抗戰，繼而消極參加抗戰，終而暗中破壞抗戰，甚至勾結敵人，陰謀消滅人民革命力量；從而使學生確信蔣介石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公敵，抗戰勝利後是美帝國主義忠實走狗，因此我們要打倒美帝，反對日帝的復活，我們同時就要肅清龜縮在台灣的蔣介石殘餘匪幫。

（3）使學生認識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是在毛澤東思想直接指導下進行和取得最後勝利的；從而要防止和抗拒帝國主義的繼續對我侵略，必須加强毛澤東思想的學習。

（4）使學生認識蘇聯在抗戰中援助我國最多，蘇聯才是我們的忠實患難朋友，美英帝國主義非但援助我們很少，而且表面上援助我們，暗中卻幫助日本壓迫國民黨反動派投降日寇，企圖出賣我們抗戰的利益；從而確信毛主席所指示中國革命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蘇聯這一邊，是完全正確的。

（5）通過以上的教學目的，我們要使學生在學習了這一課之後，獲得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今天既獲得了受着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以平等待我的蘇聯民族的援助下，我們有能力和有自信，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後勝利，有效的反對美帝重新武裝日本，和打倒美帝對我國的侵略，解放台灣，肅清蔣介石匪幫的殘餘勢力，完成全中國的解放。

（二）教學重點

爲求達到上述的教學目的，我以爲教學重點應該是着重說明下列幾個方面：

（1）抗戰以前的兩種政策和兩種行動——即（a）國民黨反動派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政策和對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華北防共協定等等賣國罪行；與（B）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積極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救亡的革命行動；如一九三五年中共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有名的『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年十二月，毛主席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決定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政策；此外中共在一九三五年領導了『一二九』學生抗日救國示威運動，和在一九三六年一月領導組織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日行動；而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更是在抗日救國的行動中，最忠實於人民，最忠實於國家民族的突出表現。

（2）抗戰以後的兩個戰場和兩條路線——即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以及所執行的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線與共產黨所建立的解放區的敵後戰場以及所執行人民戰爭的路線。

在第一種路線支配之下所採取的辦法是繼續獨裁，反對民主的辦法，壓迫人民羣衆運動，只實行片面的軍隊抗戰的辦法，共結果是前線節節敗退，華北、華中、華南、廣大領土淪陷敵手，國民黨則不斷動搖，八次醞釀降敵。隨着大漢奸汪精衞的公開叛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底重點，便『由對外逐漸轉移到對內，』這首先表現在它的軍事政策上採取了對日作戰的消極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的戰場上，讓日本人大舉進攻解

放區，自己則坐山觀虎鬥」（論聯合政府）。同時公佈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對於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製造多次『慘案』，不斷進攻中共敵後抗日軍隊，屠殺中共抗日幹部人員，和摧殘抗日文化。最後，通過日本浪人——黑田，漢奸——吳開先。敵酋——谷獲，與日寇勾勾搭搭，緊跟着出現了所謂『曲線救國論』，和十八批將領的先後奉命投敵。

在第二種路線支配之下所採取的辦法是實施民主，反對獨裁的辦法，依靠人民力量，組織各種抗日民衆團體，組織民兵，組織游擊隊和自衛隊，提倡軍民合作的辦法，因此表現爲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結果是平型關大捷和『晉冀察』，『晉綏』，『晉冀魯豫』，『冀東』，山東，長江兩岸的『蘇南』，『淮南』，『淮北』，海南島，東北等地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底建立，發動百團大戰，摧毀了敵人陰毒的『囚籠政策』，造創『麻雀戰』，『地道戰』等新的人民戰術，粉碎了敵人各次的『掃蕩』和『清剿』堅持了敵後的鬥爭，收復了廣大的國土，解放了幾千百萬的人口，殲滅了和牽制了敵人巨大的兵力，奠下了持久抗戰以至於最後勝利的基礎。

這兩條路線的存在和鬥爭，曾貫串着抗戰的整個過程，而這兩個戰場形勢的轉變——即共產黨敵後根據地的不斷擴大與國民黨統治區和敵人佔領區的不斷縮小，決定了抗戰的最後勝利。

所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美國『新共和』雜誌刊載『遠東的混亂』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國民黨『中央政府在目前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更爲關切，對日作戰，實際巳經停頓，重慶數十萬最精銳的部隊却浪費在西北共產黨統治區域的邊緣，有些新近從中國歸來的觀察家認爲中國共產黨只有有限的資源，但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做的事情却比重慶政府爲多』。

即在敵寇的政論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中國民衆抗日意識的源泉點』（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出版日本『澤友』雜誌六卷一期載松木鈴吉著『中日事變解決的要諦』一文，『眞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見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日本東京同盟世界週報二十五卷十二號『國共相剋的近況』一文）

此外一九四四年日本東京東亞同文會出版的『支那』雜誌五月號載高木陸郎著『解決中國問題的基礎及其及其可能性』一文亦稱：『今天與日軍迎頭作戰的，可以說實際上已經不是重慶軍了，它在華北是共產軍……本來重慶就是因爲西安事變才不得已和中共抗日陣營妥協的，可是蔣介石的主張却仍是以『剿共重於一切』，與此相反，中共的主張是『抗日重於一切』，中共抗日是目的的，本質的，蔣介石抗日是把握民心的手段，是政略的，所以蔣介石抗日是有一定限度的，這就是蔣介石在華北的戰線廻避和日軍作戰的理由……可以斷定，重慶所不能兩立的，倒不是對外關係上的日本，而是對內關係上的中國共產黨……所謂抗日陣營（指重慶蔣介石）與和平陣營（指南京汪精衛），只能在地圖上和外表上來區分，至於它的內容，難於截然劃分』。

以上這些材料，對於誰在抗日這一點，眞是最好的說明。

（3）日本投降後的兩種命令和兩種結果——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延安與重慶同時發出的兩種不同的命令及這兩種命令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朱德總司令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在延安總部一連發出了五道命令，令各解放區的抗日軍隊積極向敵人佔領的交通要道進兵，迫使敵僞投降。這是一種保證抗日革命勝利的命令。而重慶的蔣介石則電令僞軍，切實負責維持治安，八路軍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這是一種反動的違背民族利益的命令。

這兩種命令的結果，一方面是出現了雄偉的中共大進軍，另一方面則出現了醜惡的蔣敵僞合流。因爲日寇宣佈投降之後，敵僞軍非但未執行投降命令，反而利用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保存武裝實力，企圖改頭換面，將來『東山再起』，因此朱總司令發出大反攻的命令，發動勝利的大進軍，從八月十一日發佈命令之日起，迄同年十月十日止，僅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就收復了三十一萬餘平方里的國土和一百九十六座城市，解放了一千八百餘萬的人口，俘獲了十六萬餘的敵僞官兵，接受了三萬餘的投降隊伍。在這個大進軍中，民兵奮隊殺敵，人民支援前線。上海工人及江南農民紛紛參加抗戰，尤表現出無限英勇。敵僞軍在我軍民勇猛的進攻下嚇得發抖，許多僞軍自動放下武器，更有不少反正投到人民抗日陣營方面來的，沒有這樣威猛的反攻就不能保證敵僞投降的有效實現。

當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掃清敵僞的時候，蔣介石却進行與敵僞合流。『八一五』之後，蔣介石委任了大批的漢奸担任總司令，綏靖主任等職——龐逆炳勳被委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孫逆良誠被委爲第二路軍總司令，周逆佛海，羅逆君強被委爲上海行動總隊正副司令，吳逆化文被委爲濟南綏靖主任，門逆致中被委爲北平綏靖主任，任逆援道被委爲先遣軍司令。昨日的漢奸，今天竟成爲國民黨的軍事大員。日軍依然拿着武器，少數被繳械的部隊又被國民黨改編爲『自願軍』，給他們以繼續屠殺中國人民的任務。究竟是蔣介石接受敵僞的投降？還是蔣介石投降了敵僞？從以上的事實看，眞使人難於分辨了。

從以上兩種政策，兩種行動，兩個戰場，兩條路線，兩種命令和兩種結

果的對照中，我們就很容易使學生清澈的了解，在八年抗日戰爭中，誰是抗戰的推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誰是抗戰的主力，誰在阻撓發動抗戰，消極應戰和破壞抗戰，誰在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誰在捍衛國家民族利益了。

（4）毛澤東思想對抗戰方向的正確指示——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大會戰前後，國民黨反動集團中，曾出現了「亡國論」與「速勝論」的兩種論調。「亡國論」者從「唯武器論」出發，認爲中國武器不如敵人，尤其海軍空軍更是殘缺，在敵「强」我「弱」的對比形勢下，中國「抗戰必敗」，「再戰必敗」，因而結論就是「亡國」。於是每當戰局稍有不利，他們就大倡「妥協求和」。而「速勝論」者則對於抗戰却抱絕對樂觀態度，認爲日寇侵華戰爭只能打三個月至六個月，六個月不能結束戰爭，國際一定有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因此每當戰局一時有利，他們就給勝利衝昏頭腦，大叫「決戰」，「反攻」，「半年勝利」。但「速勝論」者是空想主義者、所以當他們這種空想被事實所粉碎而趨於幻滅時，他們就很快的墮入悲觀主義的「亡國論」的深淵裏去了。徐州會戰失敗後，亡國論調更一時高唱入雲，汪精衛曾公開發表願意接受「和平調停」的談話，在這種失敗情緒影響下，一般人士對於抗戰前途也很感憂慮，甚至感到徬徨和失望。在這種緊急關頭，全國人民都渴求對於抗戰前途有一個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抗戰進程中的方向，於是這個偉大而光榮的艱巨任務，就不得不落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了。

毛澤東同志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三八年六月——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不朽工作——「論持久戰」，具體的分析了敵我之間矛盾的基本特點，一方面在軍力上是敵强我弱，但另一方面敵人是小國，退步，寡助，我國是大國，進步，多助，指出「亡國論」者只看見敵人軍力之强，忽略了小國，退步，寡助之弱和我國是大國，進步，多助等有利條件，而「速勝論」者則根本把「强」「弱」矛盾的條件忘掉。因而認定「亡國論」與「速勝論」都是錯誤的論調，同時確立了在戰略上的「持久戰」的方針，指出抗戰須要經過「戰略的防禦」，「戰略的相持」，「戰略的反攻」三個階段，然後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因此他的結論是：「中國會亡嗎？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能速勝嗎？不能，戰爭是持久的」，而這種持久「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則存在於民衆之中」。以後的抗戰進程證明毛澤東同志這種天才的論斷完全正確。

同年九月，毛澤東同志又發表了「論新階段」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十五個月來的抗戰經驗，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抗戰將步入相持階段，當前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以便克服困難，增加力量，停止敵之進攻，實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後勝利。

「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這兩本名著，是抗戰時期黑暗中的兩盞指路的明燈，它放射出巨大的光芒，照耀着廣大人民向勝利的途程邁進。

當抗戰步入第三個年頭的時候——一九四〇年——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正被中國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所打退，美英帝國主義的「遠東慕尼黑」陰謀和蔣介石的投降活動也再次受到人民的揭發和打擊，同時敵後戰場的戰鬥正進行得空前激烈、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於粉碎了敵人的殘酷「掃蕩」之後，大大的擴展了敵後根據地的領土、人口、軍隊和黨員。可是那時嚴重的鬥爭仍然放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前面。「很明顯，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國，說能够贏得抗日的勝利，誰就能够贏得全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既然證明了自己是抗日戰爭的眞正的領導者，就必須同時向全國人民說明自己對於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的全部見解，以便澈底剝奪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一切追隨者的精神武裝，而給與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裝？」（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於是毛主席便於同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部有歷史意義的巨著。「新民主主義論」從中國的歷史和世界歷史出發，說明了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工人階級；說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說明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必須採取旣區別於資本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極大地幫助了黨內的思想統一和全國革命人民的思想統一，極大地幫助了全國人民解放區的政策的統一，因而極大地加强了中國革命。」（同上引）。

這部革命巨著的發表，其偉大的作用所達的程度，甚至使敵寇也懷着戒愼恐懼的心情予以注視。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日本「東亞」月刊載「赤色民主革命與民主主義實質的估價」一文就說：「最值得我等注目的，卽毛澤東之『新民主主義論』……此『新民主主義論』乃在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之下，集中中共一切工作與理論之大成……中共無論國際情勢如何激變，國共合作關係如何浮動，決不稍緩其民主化工作之努力……中共二十年來永遠忍耐如一，其沈着胆大與忍耐性，其勇敢與執拗可謂異常，決不容吾人輕視之」。

抗戰勝利的前夕——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論聯合政府」爲題作了一個政治報告，這個報告用馬列主義的方法，總結了八年抗戰的經驗，總結了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經驗，總結了一百年來中國民主運動的經驗，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分析了日寇的國內外形勢，分析了國民黨統治區解放區的形勢，最後還分析了中國共產

黨黨內和黨外的形勢，規定了各方面的政策和任務，他的結論，總結起來一句話便是：『走團結與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是中國人民抗戰與民主鬥爭的指南，全國人民遵循着這個指南前進，不僅已取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而且取得了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

（5）蘇聯是我們忠實的患難朋友——過去很多人僅從表面上看到美英帝國主義在抗戰期間所給予我國的援助，而忽視了蘇聯在同期間所給予我國的援助却超過了其他國家（包括美英在內）的總和（參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文大美晚報載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郭泰祺演說）。這是因爲蘇聯自『七七』以後，每次援助中國的物資金錢，國民黨政府從不公佈其眞相，蘇聯亦樸實而不自我宣揚，可是事實究竟是事實，因此我們仍可從國民黨官方人員片斷的談話中，從其他中外報章雜誌零星的記載中，洞燭蘇聯偉大友誼的眞象。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上海中報載孫科從莫斯科談判援助成功抵倫敦對記者稱：『……總之，蘇聯給予我人之援助與軍械，實較其他國家爲多』。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倫敦出版的『觀察家』及同年十一月二日倫敦出版的『世界新聞與評論』稱：『從一九三七年七月到現時止，在這些艱危的日子裏，美英給予中國多少貸欵呢！美國是七千五百萬元，英國是二千七百萬美元，合計是一萬零二百萬美元。至於蘇聯除去贈送的和犧牲了人命不算——按蘇聯援華空軍戰士在抗戰開始後的一年半中僅因對日作戰陣亡的就有二百多人——對中國的貸欵共是四萬五千萬美元，即比美國多六倍，比英國多十七倍，比美英的總合多四倍半。此外蘇聯幫助中國開闢自陝西經甘肅至新疆的西北公路，運輸軍火與一切供給』。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蔣宋美齡因在美借欵和要求援助一無所得，氣憤之餘，不得不在華盛頓說了實話：『中國抗戰三年來得自蘇聯之物質援助，實較自美英方面獲得之總和多至數倍之多』。

以上我們僅從物資金錢的數量上比較說明，我們進一步從美英和蘇聯援助我們的目的和他們對我們所索取的代價來加以研究，那更可以看出這兩方面的援助所給予我們的實際效果，更是大不相同。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這一點分析得很明確，我們不妨引用它來作說明：『我們知道蘇聯的援助中國……她不像英美那樣要以關稅，錫砂，鎢礦，錫，桐油來抵押，在平衡兩國的貿易上，她聽任中國以最賤價的茶磚給她。我們還必須指出，英美與蘇聯對華的援助，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所有英美對華貸欵的抵押品是以比市價平均減低四分之一成交的，而蘇聯除了贈送之外，收回的那些茶磚及礦產是以比市價高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成交的。此外還有一點更其根本的差異：蘇聯的貸欵是全部用以折算軍火的，她所核算的軍火價目，已經低於市價八折以下，而英美的信用借欵，主要是放在平衡貿易上。我們且撇開奢侈品的大量入超不談，要知道英美每次對華借欵都有它的政治目的，當英美決定貸欵的當兒，往往就是日本加緊對華誘降的時候。其實，英美只是以她對日貿易的一部份利潤貸華而已。如果她能放手禁運，比一百倍的現況援華還要高强：……可以說，如果中國向蘇聯借到一個錢，其實際價值要等於英美援助的三個錢。我想，這該是最謹愼的估計。』所以，就蘇聯當時援華的實際效果來說，更是超過美英多倍。

此外英國在我們的武漢失陷之後，因應日本亟盼和平，曾企圖誘勸國民黨與日本議和，美國亦圖支持英國主張，進行『遠東慕尼黑』的陰謀醞釀（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社電訊）。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與日本外相有田於會商『天津事件』，訂立『有田克萊琪協定』時，日本曾要求英國放棄其所謂『觀蔣反日』政策，促使英國及早以『調停者』資格加緊作『遠東慕尼黑』會議的再醞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日人松岡與美人格魯在東京會議，又再一次醞釀日美妥協，以圖犧牲中國的『遠東慕尼黑』的新陰謀。

而蘇聯却在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定如一的支持中國抗戰。中國古語說：『患難見朋友』，從抗戰中，使我們認識蘇聯民族眞是我們忠實的患難朋友。至於蘇聯最後出兵對日作戰，決定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那更是衆所週知的事實，似乎毋須贅述了。

（三）小結

日本侵略者的對華戰爭是被打敗了，但迄今爲止，我們仍然不會——而且永遠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所給予我們的災難和創傷。年來美帝非但積極重新武裝日本，企圖使日本侵略者復活，而且美帝自己正重彈着田中的『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朝鮮』的舊調，踏着日本侵略者所已走過的死亡道路行進，實行侵略朝鮮，侵略我國，結果在朝鮮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共同抗擊下，已日陷於失敗的深淵，最近不得不要求和談。在這次和談中，如果美帝並無和平誠意，故意提出無理要求，致使和談失敗，那末日本侵略者所已遭受過的命運，無疑的就是美帝將來的命運。因爲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證明：『在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下，依靠人民羣衆的團結奮鬥，依靠人民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爭，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可以打敗的。這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都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眞理。抗日戰爭又證明：英美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始終抓着敵視態度的，只有蘇聯，才是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忠實援助者。蘇聯的援助，對於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具有決定的意義。這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殖民地人民，同樣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眞理』（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中國近代史講課記錄

司綏延

一 戰前國內外情勢與美國助日侵朝

日本明治維新的本質？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德川幕府時期，特別在江戶、大阪和京都等西南諸侯藩閥統治區域，有勢力的「大名」（諸侯），為了鞏固其統治權，曾舉辦藩營事業，並勾結大阪和藩內的大商人開設問屋（行），統制農村的副業和生產品。為了更強化與擴大他們的封建統治與剝削，加速了貨幣的積蓄與農村破產，可是把貨幣轉變為資本，開設工廠，把沒落的農民，轉變為工資工人，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成分，還是很少。

「明治維新」是資產階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適應時代的要求，想與當時國際資本主義國家為伍，乘西方國際資本主義正集中目標和力量侵略中國之際鑽空子而成功的。成功的是天皇、西南諸侯，武士出身的人物和商業資本家，他們仍舊是從前封建時代的統治者。「維新」的具體辦法，目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的「藩籍奉還」到一八七六年的「家祿奉還」和「金祿公債」的發行，廢除了舊封建制的身分制度，達到國內政治的統一。廢除了存在各藩之間的關稅壁壘，達到國內貨幣與金融的統一。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打下一定的基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七二年解除「田地永代買賣」的禁令，公認土地的私有制。一八七三年規定土地所有者徵收與德川時代同額的地租。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本質上還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剝削關係。農民一方面苦於高額地租與重債的壓榨，一方面被零碎的耕作方法所束縛，就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

「明治維新」後工業資本的發展，首先是為軍事服務的。一開始就向軍事膨脹方面前進，集中全力辦理軍事工廠。並在軍部計劃之下，辦理鐵道、電報、電話……等交通事業。另外扶持財閥辦理煤礦、造船、製鐵和水泥廠等工業，如三井的三池煤礦，三菱的長崎造船所，淺野的水泥工廠等。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有三：

第一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它與封建主義相聯系，在廣大農村中，地主階級向佃農榨取高額地租，所以一般農民的購買力很低。農村固有的社會關係和家族關係也儘量利用到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上，如年期制度、職級制度等等都是帶有封建性的，因此工價特別低廉，督工制度特別殘酷。

第二是與中小企業和手工勞動相結合的資本主義。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機器生產的，在日本則儘量交由中小工業包工，或利用家庭手工，這樣就可以進行無限制的榨取，還可以節省資本，減少生產費，逐漸發展積蓄資本，再由財閥接辦。

第三是軍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日本在國內以廉價僱用勞動力，雖然生產品可以比較便宜。但由於工人與農民的極度貧乏，國內市場非常狹窄，因此必須有軍事力量和絕對侵略的性格，作商品推銷的保證，作到即便是粗製濫造的也可以高價獨佔市場，強制銷行，否則就沒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總之，日本資本主義雖然是後進的，但一開始就有絕對政府權力和軍事力量作開路的急先鋒。當他本國還受着外國不平等條約痛苦的時候，就開始侵略他國，把自己的痛苦，加諸鄰國，以求自身的發展，日本之所以於一八七三年侵略台灣，次年又侵佔琉球，隨後，又繼續侵略朝鮮，發動中日戰爭，這就是最基本的原因。

中國擴充北洋海軍的內幕。

海軍是「洋務運動」內容之一，當每次外交失敗之後，李鴻章為了掩蔽其賣國罪行起見，都曾抱怨「水師尚未練成」只得「含忍議欵」。滿清政府於一八八五年十月設海軍衙門，派奕訢為「總理」，奕劻和李鴻章為「會辦」，但實權仍操在李鴻章之手。到中日戰前，北洋海軍已有兵艦二十五艘，從表面上看來，「已有深固不搖之勢」（註一）實則並不如此。李鴻章辦海軍也和辦淮軍一樣，實在是一個極大貪污的機構。「在兵艦上，每一門大砲只有幾顆砲彈，甚至大砲的瞄準鏡也被偷去。他不知道（？）歐洲人把破爛的東西銷售中國，許多子彈、水雷、魚雷都是砂和豌豆填塞的，泥土代替了火藥、大砲的發射機不生作用，而子彈則不合槍枝的口徑」。（註二） 經手購械的官吏，發了橫

財（如李鳳苞貪污至百萬兩）。「在他周圍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門機關裏，有的都是他自己派的許多無賴漢，他們只是忙着把錢裝到荷包裏，出賣了國家的安全」。（註三）至於他本人，「世人競傳李文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約數萬金之產業意中事也。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分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商舖銀號全屬其營業云」（註四）同時，滿清政府怕漢人强大，藉口籌餉，停止南北洋購買外國槍砲、船隻、機器撥欵。加以李鴻章爲了迎合慈禧和奕譞，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意把每年四百萬兩的海軍費，提出作修建頤和園之用。所以「一八八八年以後，停止添船，一八九一年以後，又停購軍火。園工所費銀約三千萬兩」。（註五）慈禧之所以能修園享樂，李鴻章實在是一個大幫兇。中日戰爭，李鴻章仍一貫施行投降的戰略，再加上這樣練的海軍，失敗是當然的。

美國助日侵略朝鮮。

中朝人民，自古以來，關係非常密切。就地理上說，國境相接千餘里，是唇齒之邦。就政治上說，在中日戰前，有着不同情況的同一命運，是利害相關患難與共的朋友。就文化上說，同是東方文明古國，是一個淵源是一個系統。在甲午戰前，中國是列强侵略的對象，朝鮮也是如此。一八六六年，就有美國人普來屯，乘機侵略，隨後，又遭到法國的進攻。都被英勇的朝鮮人民所擊退。（註六）一八六七年，法、英、美三國曾經計劃聯合進攻朝鮮，結果沒有實現。一八七一年美國艦隊到江華島，發動對朝鮮的軍事進攻，朝鮮人民慷慨奮發，羣起參加義勇軍，赴前線殺敵。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朝鮮人民以必死的決心鬥爭，他們的勇敢是世所罕見的，從來沒有一個民族能超過他們」。（註七）結果美國完全失敗。

美國屢次侵略朝鮮，都遭到失敗，才開始帮助日本，侵略朝鮮，這一個計劃，正也與日本的大陸政策相吻合。一八七五年，「日本以兵艦入朝鮮江華島，毀其砲台，焚永宗城，殺朝鮮兵，掠軍械以去，復以兵艦駐釜山」（註八）次年脅迫朝鮮訂江華條約。承認朝鮮爲自主國，互派使臣，並開仁川元山爲商埠，日艦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當時日本處心積慮，使朝鮮脫離中國，朝鮮問題，日益嚴重。一八八二年，美國也脅迫朝鮮，訂立仁川條約，取得許多特權。一八九〇年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說：「美國挑撥朝鮮與中國脫離關係，美國在朝鮮已取得採礦權和海關特權，美國在朝鮮陰謀煽動的幕後人，就是一八七四年勾引日本軍進攻台灣的李仙得」。（註九）當時，袁世凱是滿清駐朝鮮的「代辦」。接着大批的美國人在日本的推荐之下，與日本人共同進行掌握朝鮮內政，外交，軍事等大權，準備實現其大陸政策。

二　中日朝鮮交涉與李鴻章的賣國外交

朝鮮宗主權問題——日本千方百計使朝鮮脫離中國。

遠者姑且不論，「朝鮮自前明，隸中國藩服，修職貢甚謹」。（註十）明末抗清時期，朝鮮曾出兵協助。清太宗征服朝鮮後，徵朝鮮兵攻明，朝鮮曾表示拒絕。清入關後，朝鮮王孝宗尙訓卒厲兵，欲伺其後。當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際，朝鮮志士羅碩佐三上萬言書請從後襲擊。由此證明，朝鮮人民對中國是如何的關切。因爲在中日戰前，朝鮮早已經又是中國的藩屬，所以日本想吞爲已有，首先就是使朝鮮脫離中國，江華條約，就是這種野心的表現。所以在戰前的中日交涉，也就是爭奪朝鮮宗主權的交涉。

濟物浦條約——日本在朝力的擴大。

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兵士暴動，失勢的大院君利用這個機會想顚覆以閔黨爲中心的新政府，殺日本敎練官並襲擊日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事先逃回長崎，隨後率兵到朝鮮，中國也派丁汝昌、吳長慶率軍便宜行事。結果逮捕大院君並斡旋日本與朝鮮在濟物浦訂約。朝鮮承認懲兇、賠欵、謝罪等條件，並允許日軍駐在朝鮮京城，從此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更進一步地擴大。

天津條約——朝鮮等於中日兩國共管。

一八八四年，日本駐朝鮮使館，私藏槍械，策動反對朝鮮政府的政變，殺朝鮮輔國閔台鎬等八人，欲廢朝鮮王。中國令吳長慶等平亂，日使竹添進一郎自燒使舘，藉口向朝鮮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朝鮮又承認賠欵、懲兇、謝罪和增加駐軍等條件。一八八五年，日本派伊藤博文到天津商訂朝鮮和約，滿清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結果訂立天津條約，規定兩國駐在朝鮮軍隊，各盡撤還；朝鮮練兵，中日兩國，均不派敎官；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第一、二兩項，等於使中國放棄朝鮮的宗主權，第三項又是中日戰爭的伏線。總的精神，等於朝鮮由兩國共管，也是李鴻章打算斷送朝鮮的開始。

引俄制日——李鴻章的賣國外交。

李鴻章的外交政策，向來是標榜「以夷制夷」的。他「前半生最親英國，後半生最親俄國」。（註十一）當日本侵略朝鮮越來越露骨的時候，他曾致書朝鮮大員說：「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註十二）其具體的辦法，從天津條約訂立後到中日戰爭前，留袁世凱爲「總理」，監督朝鮮政治。派親俄分子德人穆麟德替朝鮮辦理外交，希望引俄制日。後又派美人德尼代替穆麟德，事實上給美國和日本服務，唆使朝鮮「結洋獨立」。朝鮮遂私派駐美公使，表示外交「自主」，而用李仙得辦理外交，表示政治「自主」。因袁世凱對朝鮮有極大的野心，而

侵略分子，又從中挑撥破壞，結果弄得朝鮮政府變爲「親美、疏俄，仇清，惡日」。滿清依俄虛聲援助，日本得美國實力支持，時局越緊張，朝鮮政府親美態度愈顯著。由此可以看出李鴻章的外交辦法是賣國的，而美國的侵略的辦法是陰險毒辣的。

三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與美國的帮兇

中日戰爭的導火線。

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道事件。東學道又名東學黨，是朝鮮人民反政府的秘密組織。口號是「逐滅夷倭，滅盡權貴」。主張是「明人倫，誅汚吏，救民生」。首領崔福成於三月在全羅道的古阜縣起義，得朝鮮廣大人民的響應，攻下許多城市，京城告急。朝鮮政府向中國求救，李鴻章派葉志超率軍二千五百人屯駐牙山，日本得中國知照，亦即出兵，並陸續增至一萬二千五百人。東學黨事平，日本堅不撤兵，並積極干涉朝鮮內政。由於日本對中國軍隊進行野蠻的進攻。爆發了中日戰爭。

戰爭第一階段——一八九四年六月——一八九四年八月。

李鴻章在中法戰爭中，決不肯用他的兵力。在中日戰爭中，更是再三迴避，終於無可奈何才勉强應戰。「當時日兵皆據王京要隘，而中國屯牙山兵甚單，李鴻章始終欲據條約要求日本退兵。……日使大鳥圭介逼朝鮮完全自主……李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欵三百萬並多方要脅。國人大譁……翁同龢、張謇均主戰，而李鴻章仍不欲失和」。（註十三）這樣日本既積極備戰，而中國尚因循苟且，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階段的海戰方面，第一是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牙山附近戰役，二十一日戰爭已開始，李鴻章才被迫派二千人增援。事先洩露行期，以致高陞輪被擊沉。（註十四）使牙山孤軍陷於無援的境地。加以日本在未宣戰前，竟擊傷我國濟遠艦，致廣乙艦焚燬於十八島。滿清政府乃於七月一日對日本宣戰。第二是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的大東溝附近的戰。是役我國損失致遠、超勇、揚威、經遠等艦，官兵犧牲共七百餘人。日艦受傷五隻，官兵死傷共六百餘人。

這一階段的陸戰方面；最著者第一是成歡戰役，是役因葉志超放棄牙山退至公州，聶士成守成歡驛，日軍來攻，聶軍先小勝後大敗，放棄成歡，葉軍不戰先退，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到平壤集中。像這樣可恥的作戰，還虛報戰功，竟得到滿清政府的嘉奬。第二是平壤戰役。是役葉志超是總指揮，統馬、左、衛、豐四軍共二十九營，未戰先逃。總兵左寶貴戰死平壤，其他各軍，紛紛敗退，撤出朝鮮國境。

戰爭第二階段——一八九四年九月——一八九五年四月。

這一個階段的戰爭，是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以內進行的。陸戰方面：第一是奉東戰役。當時宋慶統率諸軍，完全採取防禦戰略，以致九連城不戰而陷，虎山、鳳凰城相繼失守，最後安東放棄。結果沿鴨綠江全境，悉淪於日寇之手。第二是遼東戰役，主將是聶士成，各軍不能協同作戰，反被日本個個擊破，以致遼東金、復、海、蓋等地，相繼淪陷。

海戰方面第一是旅順戰役，日本首先進攻大連，清軍不戰先逃。日軍進攻旅順，統帥龔照璵早已逃往天津，姜桂題束手無策，日寇於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攻下旅順，旅順有海岸砲台十三座，陸路砲台九座，大砲七、八十尊，多數是德國克虜伯廠出品。李鴻章經營旅順十六年，費銀數千萬兩，號稱「北洋精華」，至此完全送給日寇。第二是威海衛戰役，是役李鴻章一味叫丁汝昌潛伏不出，困守港內，坐待殲滅。作戰期間，怕死的將領，竟勾結洋員，煽動兵勇水手叛變。洋員並乘機勸丁汝昌投降，汝昌令港中餘船十隻，猛撲突圍，將領又抗不聽命，指使弁兵持刀威嚇汝昌，汝昌不得已，服毒自殺。結果李鴻章經營十六年的北洋海軍，至此完全毀滅。

主戰派作最後的嘗試。

當淮軍節節敗退之際，滿清主戰派又起用湘系軍閥，派劉坤一爲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山海關內外駐軍共六萬餘人，作最後的嘗試，但結果日寇自海城進攻，牛莊、營口，田台莊相繼淪陷，仍無補於實際。北洋海軍失敗後，日軍又將澎湖全島佔領。至此中國完全失敗。

美國積極作日本的帮兇。

這一次戰爭，日本所以敢於對中國作戰，主要的仗美國在幕後撑腰，美國在表面上僞裝中立，實際是左袒日本。宣戰前美國駐朝公使向他的政府報告說：日本如能「一舉而消滅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註十四）對美國有重大的作用。日人窪田文三在他所著「支那外交通史」中也說：當時「美人認爲日本人的成功，不啻美國人弟子的成功」。一八九四年九月，清軍在平壤、黃海戰敗，英國表示願與美、俄、法、德等國共同調處，但美國認爲日本在這時候，還沒有取得「全局勝利」，調處只是便宜了中國，所以不願參加調停。到十一月清軍一敗塗地，遼東、山東同時告警，滿清政府不得已請美國單獨進行調處，此時美國一方面認爲日本已獲「全局勝利」，另一方面考慮到一種新情況可能發生，即日本如繼續前進，必然會引起國際干涉，那就會使美、日同陷於不利。國務卿格來錫基於這個立場，就對日本駐美公使栗野說：「日本應當停戰，倘使再繼續下去，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英、法、德、俄等國、一定要瓜分它……。」（註十五）日本非常同意美國的勸告但顧慮到另一層，如果美、日把這種雙簧演得太露骨，同樣有引起國際干涉的危險。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秘密對美駐日公使譚安說：「日本政府現在若公然請美國爲中日間之仲裁者，或不免招致其他第三國之干涉，故不能不避免此事，異日若由中國開講和之端緒時，美國居間交換彼此之意見，則我政府當深倚賴美國政府之厚誼」。（註十六）果然滿清政府很快地就正式經過美公使田貝向日本

求和了。美國這才以唯一的「中間人」自居，反對其他人參加，並主張和約的成立，愈快愈好。議和開始，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接受二萬五千美金的重賞，以所謂「私人」的資格，充任中國議和代表的法律顧問兼外交顧問，很受李鴻章的「倚重」。另一個美國人端迪臣則是日本代表團的顧問。端迪臣在那邊「為日本起草約稿，需欵索地」。(註十七)科士達在這邊警告滿清政府不要「借助英俄」，干涉日本。其實就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就是「並不希望中國有任何成功」。美國就這樣幾面串通一氣，打擊中國。另外科士達還教給李鴻章一套賣國割地的辦法，把台灣的地契交給日本即可，不必親身到該地辦理移交，因為當時台灣人民正展開反投降反割地的英勇鬥爭，是無法親身辦理的。後來李鴻章之子李經芳在淡水港日本軍艦上把這賣國任務完成了。

美國從戰前到戰後，給日本作幫兇，馬關條約，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了。規定承認朝鮮完全自立，割遼南、台灣、澎湖全島給日本，賠軍費二萬萬兩，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其所製造貨物，對一切課稅及租棧利益，並得享受豁免及其他優例，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等項。中國的損失，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失敗的原因。

這一次戰爭，中國為什麼失敗的呢？就軍隊說：是半新式的軍隊。這種軍隊和指揮他的軍閥，有足夠的力量肆虐於國內，卻無力量從事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又是風紀敗壞的軍隊。例如當中國軍隊開到平壤的時候，朝鮮人民，爭獻酒食慰勞，沒想到大軍過境，毀器物，燒房屋，奪財貨，淫婦女，殺平民，捉壯丁。由義州到平壤數百里間，商民逃避，定州燒屋幾及半里，沿途鍋損碗碎，不但夫馬難覓，且途中飯舖皆無。(註十八)這簡直是一羣官士匪。同時也是貪污腐化的軍隊。例如衛軍「平日尅扣軍餉，不得軍心」。李鴻章任用私人管理糧台軍械，牙山戰役，缺乏糧餉，平壤戰役，缺乏軍火。官兵關係是「虐待士卒，兵不服將」。友軍關係是「坐觀成敗，不相救援」。(註十九)

就外交說：李鴻章當時獨辦外交，初則依靠英、德、法、俄，最後依靠美國。並且在通敵賣國的罪行上是非常兇惡的。在戰爭過程中，李鴻章放日本米船許日本運開平的煤，將前膛槍子賣於日本，得銀十四萬兩，遇有日本間諜，不是明縱就是私放，台灣拿獲日本運船，竟請旨釋放。(註二十)

就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說：中日戰爭帝黨是主戰，后黨是主和。慈禧只圖享受其荒淫無恥的生活，大局雖然緊張萬狀，但頤和園的工程還不許停止。主戰派請減少工程，還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令彼終身不歡」。光緒帝之所以主戰，實以抬高自己地位，對傀儡皇帝作一下掙扎為基本原因。當時慈禧常住頤和園通過李蓮英貪污納賄，無所不為，光緒的愛妾珍妃也從事收賄賣官，兩黨發生極尖銳的矛盾。其次主戰派的人物他們大發空論，無補實際。例如志銳張之洞等主張「聯英伐倭」，根本就不可能。文廷式等交章彈劾李鴻章，當然也不會發生實效。至於翁同龢的貪污與李鴻章是大巫小巫之別，所以時人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天下荒」之句，與李鴻章並列。

李鴻章根本不想作戰，受到光緒的催促，僅僅是消極應付，催的越急，他就更倒向慈禧的一邊，光緒是沒有辦法的。他是戰爭失敗的責任者，光緒給他最大的懲罰，不過是拔去三眼花翎，褫奪黃馬褂，這有什麼用呢？究竟他還有慈禧作靠山，有外國人撐腰，當日本一再拒絕議和代表，並指定要李鴻章作全權代表以免「彼此談判之結果，免為紙上空文，必須有力實行」時，光緒就不敢怠慢，馬上就改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辦理「有力實行」的賣國外交。

以上就是戰爭失敗的基本原因，雖然主戰是應該的也是對的，但像這樣的軍隊，像這樣的外交，像這樣的內部衝突矛盾，結果一定會失敗的。

(待續)

註一：李鴻章：校閱海軍情形摺。
註二：吳清友譯：殖民地保護國新歷史。
註三：布蘭德：李鴻章傳。
註四：蔣廷黻：近代中四外交史資料輯要。
註五：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註六：劉大年：美國侵華史。
註七：科士達：美國在東方的外交。
註八：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
註九：水 金：從扶植日本到倡導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新中華十四卷七期）
註十：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
註十一：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註十二：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註十三：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
註十四：外交月報二卷三期。
註十五：劉大年：美國侵華簡史。
註十六：陸奧宗光：蹇蹇錄。
註十七：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
註十八：李鴻章：整飭軍紀電。
註十九：文廷式等：聯銜糾參督臣植黨疏。
註二十：文廷式等：聯銜糾參督臣植黨疏。

偉大的祖國建築展覽介紹

李靜昭

爲迎接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週年國慶節，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特聯合北京歷史博物館、清華大學營建系、中國營造學社等單位，舉辦了「偉大的祖國建築展覽」，由十月一日起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午門樓上正殿展出。內容係由中國原始社會起至現代的各種偉大建築。在結合着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下，由這個展覽，可以使廣大的人民羣衆認識到我們勞勤先民在建築藝術方面的偉大成就，更由此激發起愛國的熱情。因之又能使我們注意保護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這些寶貴的遺產，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這個展覽中，搜集了中國歷代的建築，如城池、宮殿、陵墓、苑囿、壇廟寺觀、塔幢、橋梁、堤坎、衙署、民居等等的極珍貴的照片模型、實測圖等資料，其中尤以建築模型和建築實測圖，爲中國建築史上極寶貴的資料。由這個展覽中能够給予我們一個極明確的中國建築沿革印象。

我們的祖先在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時代，即開始利用山穴來做人們的住所。到四五千年以前就利用大塊的石頭來建造房屋和坟墓，這由於東北的亮甲店的巨石建築和西團山出土的石棺可以證明。這就是我們建築藝術的發靱點，也就是這個展覽的開始點。

再往後的時期，我們的勞勤祖先，運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大規模的殿堂，用夯打土基，用石頭做柱礎的宮殿。給統治階級享用。這裏有排列整齊的石卵柱礎殿堂的遺跡和穴居的遺跡。其中尤以所陳列的河北邯鄲縣趙王城出土的奔鹿文瓦當和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的各種瓦當彌足珍貴，這是當時的建築實物，可以證明當時的建築術已發展到會用磚瓦來修建房屋。

（插圖一）

秦漢時代的建築，有了更大的發展，可惜木構已全部無存，只有從遺址和現存的磚石造的陵墓和祠闕、明器、畫象石等上面的雕刻可窺見一些端倪。由這些遺物上邊得知樓閣建築和斗栱結構已然開始發展，建築形式也趨複雜化了，如河南登封的三闕，闕身上雕刻的幾何文及人物等都可以證明。漢時人對陵墓祠堂已然十分注意講求，尤其四川樂山縣彭山鎮等地的崖墓，與中地所見的崖墓形制不同。因爲地勢的關係，完全是依山鑿崖，作爲墓穴，墓內有石柱，並繪有椽瓦等裝飾。在遼陽的漢墓中有彩色鮮艷的壁畫，墓室全由石塊砌成，爲我國現存的最古、最完整的漢墓，這一時期的實物，有各種花紋和文字的瓦當，各種年號銘文的墓磚、明器土俑等。由是不僅可以看出當時建築的結構，而且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活情形。

六朝時期，佛教藝術發展起來，石窟的修建特別盛行，如河南洛陽龍門、察哈爾大同雲崗、河南澠池鴻慶寺，河北磁縣南響堂山等處的石窟雕刻，更有驚人的成就。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隋唐以後，這時我們的先民對造形

（插圖二）

藝術有了高度的發展，寺廟建築益形發達，如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就是國內現存的唯一最大唐代的木構建築（參閱插圖一）。對於橋梁的建築，國內現存的河北省趙縣安濟橋，經過了一千三百餘年仍然屹立着，担負着往來交通的重任，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古代橋梁的珍例。

兩宋以來的建築，逐漸喪失例來的莊嚴豪放的作風，漸趨於形式化，但庭園建築日見發達，寺宇塑壁流行很盛，佛塔的形式變化尤多，現存木構建築如河南登封宋代的少林寺初祖菴，河北薊縣遼代的獨樂寺觀音閣，殿中的觀音像高約十五公尺，是國內最大的遼代塑像。察哈爾大同的華嚴寺簿伽教藏和金代的大雄寶殿（參閱插圖二），都是僅有實例。可惜一部份建築已被破壞，實在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山西省太原晉祠聖母廟的「飛梁」形制極古，爲建築史上唯一的孤例。察哈爾省應縣佛宮寺的遼代木塔，塔剎爲鐵製，八角五層建於遼道宗清寧二年（公元一〇五六年），斗栱、梯閣、塑像均爲遼代的原物。此外河北定縣開元寺料敵塔（參閱封面銅版）、河南開封祐國寺鐵塔等，均爲國內現存的珍貴的古建築的典型實例。

元代因與外國交通頻繁，文化上起了交流作用，由於喇嘛教的傳入，給我國建築形式上增加了許多藏式作風。如北京護國寺千佛殿和舍利塔，河北正定陽和樓等是，可惜前者已然塌壞，後者已然拆除。北京阜城門內妙應寺的白塔爲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所建，塔通體白色，是典型的藏式塔。河南登封告成鎮周公廟元觀星台是我國現存的最古的天文台，建於元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

明清兩代建築形式，日趨纖弱華麗，又加海運交通發達，歐洲建築形式傳入，大大影響了我國，尤以乾隆以後，西洋建築日益普遍，北京西郊的園林系統，就是這時期樹立的。殿堂壇廟建築如天壇、太廟、故宮三殿都是明代的建築，結構之偉大爲國內聞名。圓明園規模的廣大，風景的優美，全世界知名，是結合着西洋的形式和中國的傳統作風的形式建造的，可惜於一八六〇年被帝國主義英法聯軍所燬。

西南區的民居，在建築形式上有它獨特的風格。昆明龍泉鎮附近的「一棵印」式的住宅，雲南馬鞍山附近的木構民居等，和內地建築絕不相同，給我們增加了不少的見聞。

新中國的建立，把過去幾千年來統治階級所佔有的偉大建築，都收回來做了人民的財產，爲人民大衆來享受。如頤和園、太廟、天壇等地方作了人民的公園，勞動人民的休養所。

由於這個展覽，使我們一方面認識了祖國古代建築的美麗和偉大，另一方面感覺到作了這樣一個國家的主人是多麼的光榮。我們應當如何的愛護、保存和發揚光大它，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我們民族形式的建築作風。

徵稿簡約

一、本刊是研討歷史科學「教」「學」兩方面問題的月刊，凡有關這兩方面的專著、通論、譯述、評介等稿，一律歡迎。

二、文稿以語體文爲主，希加新式標點。

三、譯文儘可能請附原文。

四、來稿一經發表，每千字按天津人民銀行折實牌價四至八單位致酬，譯稿酌減。

五、來稿請寄天津羅斯福路二六一號知識書店轉本刊編委會，或天津天緯路河北師範學院李光璧同志轉本刊編委會。

天津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五十號
天津郵政管理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四十六號

本期零售每冊二千八百元